

認同、敘事、與行動： 台灣 1970 年代黨外的歷史建構

蕭阿勤

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籌備處

1970 年代台灣的外交挫折與社會經濟變遷等因素，激發戰後世代的社會政治改革意識。當時反國民黨的「黨外」人士是這個戰後世代的重要組成份子。本文從「敘事認同」的理論取向，探討黨外的政治改革主張與其歷史敘事的辯證關係。本文從「非工具論的情境論或建構論」角度分析，指出黨外以一種基於中國民族主義的歷史敘事，將個人自我與社會、國家、民族聯繫起來，建構戰後世代的集體認同感，而此種歷史敘事及世代認同與其政治社會的改革行動密不可分。本文的結論指出：黨外成員以中國民族主義的歷史敘事來理解台灣的過去，尤其是台灣人抗日史，將他們原本被教化的中國民族／國家認同加以充實、具體化，然而因為其強調台灣鄉土歷史與文化而有助於美麗島事件後、八〇年代初以降黨外的台灣意識、台灣民族主義的政治動員與文化建構。對台灣七〇年代黨外的集體記憶重構與族群政治的關係，及其與八〇年代以來台灣文化民族主義發展的歷史聯繫，本文提供一個具有理論意涵的分析理解。

關鍵詞：認同、敘事、黨外、世代、民族主義

Identity, Narrative, and Action: Anti-KMT Dissident Construction of History in 1970s Taiwan

A-Chin Hsiau

Institute of Taiwan History (Preparatory Office), Academia Sinica

Throughout the 1970s, *tang-wai*—the name given to anti-KMT dissidents—were at the center of the Taiwanese postwar generation's response to the country's diplomatic failures, authoritarian rule, and economic inequalities. Using a narrative identity approach to political action, I analyze the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ang-wai* political reform efforts and a historical narrative. From non-instrumentalist situationalist and non-instrumentalist constructionist perspectives, I also argue that a Chinese nationalist narrative of history helped *tang-wai* to connect individuals with their society/nation, and to form a sense of collective identity with other members of the postwar generation. My conclusion is that in the 1970s, the *tang-wai* substantiated their Chinese national identity by adopting a historical narrative to make sense of Taiwan's past, especially in terms of Taiwanese resistance to Japanese colonialism. Their rediscovery of this history contributed greatly to the political mobilization and cultural construction of Taiwanese nationalism that began in the 1980s. Here I attempt to establish a theoretical understanding of *tang-wai* reconstruction of a collective memory that incorporated ethnic politics in 1970s Taiwan and its impact on post-1980s nationalist politics.

Keywords: identity, narrative, *tang-wai*, generation, nationalism.

一、導言：問題緣起

2001年8月初，由民進黨的監察委員黃煌雄召集籌備，國史館、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等共同主辦的「蔣渭水先生逝世七十週年紀念會」，在台灣大學醫學院召開。蔣氏於日本殖民時期就讀的「總督府醫學校」，正是台大醫學院的前身。在戰後台灣首次政黨輪替執政後就任中華民國總統一年多的陳水扁，也蒞臨致詞。甫獲執政權的民進黨，當時正備受在野的國民黨與親民黨的牽制，朝野之間充滿衝突與紛擾。在這樣的政治氣氛中舉行的紀念會，主辦單位刻意以蔣氏在1927年初勉勵台灣人一致抗日的口號「同胞須團結，團結真有力」為主題。¹黃煌雄為這次的《紀念專刊》作序時，特別強調陳水扁的出席講話，「是新執政者對蔣渭水歷史定位的明確肯定」（黃煌雄2001: 5）。這種肯定，具體而言，則是陳水扁總統致詞時認為蔣氏代表了「台灣精神」。²在近十幾年台灣政治／文化明顯地「本土化」、「台灣化」的脈絡中，這種對蔣渭水與其抗日活動的歷史定位，似乎是一種很自然的發展，不足為奇。然而對照20幾年前黃煌雄本人所發表關於蔣渭水與日據後期台灣人政治社會運動史的許多著作，則又令人驚訝於夾雜在政治變遷中所發生的歷史建構，已有明顯的差異。在七〇年代「回歸鄉土」的文化潮流中，黃煌雄與其他以本省籍政治反對運動人士為主的許多「黨外」人士類似，強調抗日台灣先輩做為在台灣之中國人之祖國認同，以及孫中山領導的中國近代民族運動對台灣先輩的巨大影響。這和帶著台灣民族主義意涵的「台灣精神」的歷史定位，相當不同。

早在1992年，黃煌雄即「改寫」其七〇年代的舊作《台灣的先

1 參見黃煌雄(2001: 5)。

2 見「中華民國總統府」網站，「總統講祝詞」網頁(<http://www.president.gov.tw/php-bin/prez/showspeak.php4>) (查閱日期：2002/5/8)。另外，陳水扁題贈紀念會的四個字也是「臺灣精神」。見王玉靜(2001: 84)。

知先覺者——蔣渭水先生》與《台胞抗日史話》二書，並重新出版（黃煌雄 1992a, b）。在二書共同的〈再版序〉中，黃煌雄重新詮釋了過去，認為「當時日據當局所稱『極端的民族主義者』或『民族主義團體』，都是指以台灣人意識為本位的『台灣的民族主義者』」與「台灣民族主義團體」。他強調絕不能抹殺「台灣近代民族運動的主體地位」，「甚至將台灣近代民族運動解釋成爲只是『對漢民族認同』下中國近代民族運動的一個支流」（黃煌雄 1992a: 10-11, 1992b: 4-5）。黃煌雄聲明改寫與重新詮釋的理由，是因爲七〇年代的戒嚴統治與史料缺乏等，使包括他自己在內的研究者與台灣近代民族運動尚存的「先覺者」本身的出版著作，「幾乎都很難完全合乎歷史的原貌」。於是他重新檢視舊作，認爲應該「以更客觀、公平的研究態度，來對待台灣近代民族運動歷史」（黃煌雄 1992a: 9, 11; 1992b: 3, 5）。

八〇年代之後，包括本文下面即將提到的許許多多黨外人士，就像黃煌雄一樣，轉變爲台灣民族主義者——容或他們個別轉變的速度有快有慢、程度或強或弱。而他們關於台灣的歷史「敘事」(narrative)，也與黃煌雄的改寫舊作類似，經歷明顯的改變。黃煌雄重新詮釋過去，事實上涉及這種普遍的認同與敘事的變遷。然而七〇年代的黨外對於台灣過去——尤其是台灣人抗日——的歷史建構究竟如何，迄今爲止，殊乏研究。本文的第一個目的，就在探討這個現象，以彌補缺憾。

再者，在台灣民族主義發展的過程中，上述從中國（民族）的到台灣（民族）的歷史敘事與認同的明顯變化，似乎爲認同議題的「工具論」提供絕佳的例證。我們只要看看那些從台灣社會內部或中華人民共和國而來的批判，認爲台灣民族主義者是「政治野心份子」，而其認同發展與歷史敘事爲「別有居心」、「喪心病狂」、「數典忘祖」之結果，就可以找到這種工具論的一個相當流行的日常版本——或者說是較粗糙的版本。³ 這種常見的政治批判對其批判對象行動的解釋，最突出的是訴諸其（政治上的、不道德的、自私的）「利

益」。對這些批判者而言，要理解（亦即批判）台灣民族主義者在情境變遷中反身地建構與再建構歷史敘事與認同的現象，必須強調（或者說揭穿）的是敘事做為達成理性行動者之「政治利益或野心」的工具效用，而非它表達了這些民族主義者真實的認知與情感。本文的第二個目的，就在從「敘事認同」(narrative identity)理論的角度，分析認同、敘事、與行動之間的關係，以反省上述工具論對認同與歷史敘事變化的理解，究竟是否恰當。

筆者先前的研究已指出，在七〇年代台灣文化界回歸鄉土潮流中，致力於探索日據時期台灣歷史的，主要是年輕的世代（蕭阿勤 2002）。七〇年代初台灣面臨的外交挫敗、國民黨由蔣中正到蔣經國的權力交替與「革新保台」政策的出現、經濟起飛後農村凋蔽、勞工問題、貧富不均等情勢的變化，激發了一股要求重視台灣現實、改革政治的社會力量。這一股新的力量主要由兩群人士組成：一是以《大學雜誌》為中心的年輕一代的知識份子、青年企業家等，另一群則為「黨外」，亦即以黃信介、康寧祥為首的新一代本省籍政治反對運動人士（李筱峰 1987: 90）。這兩群人士同時包括本、外省籍，而其共同點是即使不在台灣出生，也都幾無例外地在戰後的台灣成長，並接受國民黨體制下的教育。當他們投身於政治社會改革時，大致都在 20 幾歲到 40 幾歲之間。當時台灣社會公共領域中一波新的、非國民黨官方的日據時期「集體記憶」建構過程中，這兩群可稱之為「戰後世代」異議人士中的部份成員，正扮演重要角色（蕭阿勤 2002）。出生於 1944 年的黃煌雄，正是其中重要的一員。比較而言，提倡政治社會改革的異議份子一般著重台灣人抗日的政治或社會運動，而文學界的戰後世代成員，則專注於日據時期台灣新文學的抗日問題（蕭阿勤 2002）。筆者先前的研究已分析當時戰後世代對日據時期台灣新文學

3 這類批判最近的例子，是兩地從 2001 年左右開始出現的眾多強烈抨擊「文化台獨」、「文學台獨」的言論（尤其是來自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網際網路匯集了這些出現於各種場合與媒體的言論，數量極多。譬如林勁(2001)、陳映真(2001)、趙遐秋(2001)、王京瓊(2002)、李新乙(2002)、張詩劍(2002)、廖翊(2002)。

的集體記憶建構（蕭阿勤 2000, 2002），而本文則在探討以本省籍政治反對運動人士為主的黨外對日據時期的關注，特別是他們對於台灣人抗日的歷史建構。

七〇年代的黨外多少曾接觸那些親身參與日據時期反抗殖民統治活動者。⁴ 然而一般而言，這兩個歷史階段投身於不同政權統治下反對運動的兩個世代成員之間的聯繫，可以說相當微弱。不過雖然實質接觸的關係很淡薄，但做為戰後世代的黨外人士，卻藉著建構一個特定的歷史敘事，將這兩個歷史階段不同世代的反抗運動象徵地(symbolically)聯繫起來。也因為如此，這些黨外人士在關於日據時期的集體記憶重構過程中，扮演了一部份主要的角色。本文分析的，正是黨外如何建構這個歷史敘事而重新發掘日據時期反抗殖民統治的政治社會運動史，並且如何將它與黨外反國民黨運動聯繫起來的過程。其主要問題意識在探討認同、敘事、與行動之間的關係，而核心論點則在指出認同、敘事、與行動之間的關係是辯證的、過程的，不應片面地從工具論對本質的理性行動者的假設來理解歷史敘事與認同的建構。

二、問題意識、概念、與理論： 認同、敘事、與行動

（一）認同、敘事、行動、與「敘事認同」

最近 20 幾年，西方人文與社會科學界出現前所未有的關於敘事的種種研究。一些研究者已指出的，一個特殊的現象是：「敘事史」(narrative history)做為西方一向所熟悉的記述過去的主要方式，其價值在史學家之間引起許多爭議。敘事做為建構知識的重要取向，在其「本家」——歷史學界——受到許多批評與奚落，而許多史學家也刻意拋棄敘事的取向。⁵ 另一方面，其他學術領域卻逐漸運用敘事概念，

4 譬如「唯一在日據時代直接參與民族解放運動」的「本省老作家」楊遠(1905-1985)（葉石濤 1975: 33）與黨外的接觸，見陳菊(1978: 11)、《美麗島》1(3): 106、軒轅平(1979: 21, 24)。

並發展相關理論。在人文與社會科學界，有人稱此發展為「敘事的轉向」(the narrative turn)。在西方歷史脈絡中，有人甚至稱這種史學界與其它學術領域的明顯對照，是當代知識文化中「潛在著重大影響的一次小革命」(Somers and Gibson 1994: 38)。在社會學領域中，有人認為：1980 年代以來一些社會學者提倡將敘事做為社會學方法論的基礎，在經驗分析上重視「過程」(process)與「故事」(story)，這種想法與企圖是「革命性的」(Abbott 1992: 428)。另外則有人樂觀地相信：由於社會科學中「敘事的轉向」趨勢，一種真正的「敘事社會學」(narrative sociology)發展的契機與條件已經形成(Maines 1993: 17)。

不過我們必須注意，過去 20 幾年在西方歷史學之外的其他學術領域的敘事研究所涉及的概念，與史學家之間引起爭論的，並非完全相同。史學家之間常見的敘事概念，是將它當做「一種再現的類型」(a mode of representation)。敘事——亦即講述歷史故事——被視為歷史學者將駁雜的生活經驗條理化的再現形式，而這種再現過去的方式是「論述的(discursive)，而非量化的；是非解釋性的(non-explanatory)，而不是具有條件性的命題的(conditionally prepositional)；是非理論性的，而不是像受理論所指引的社會科學的」。歷史學者之間的爭論，通常就在於如何評價這種再現的形式(Somers 1992: 600; Somers and Gibson 1994: 58)。然而在所謂敘事的轉向中，許多研究並非簡單地接收那種被部分歷史學者逐漸拋棄的東西。在這個發展中，為了使敘事概念成為有效地分析人類一般社會生活經驗的工具，而不是只用來描述一種再現過去、鋪陳資料的方式，許多研究者事實上已將它重新概念化(reconceptualize)。

在這種分析的要求下所重新概念化的敘事，雖然有不同的定義，但其共通點都在於將敘事視為「以具有清楚開頭、中間、結尾的序列次序來安排事件(events)的一種論述的形式」，而這也是大多數研究者所認為的敘事——或故事——基本的特質(Hinchman and Hinchman

5 參見 Himmelfarb (1984: 85)、Kellner (1989: 294-295)、Somers (1992: 599-600)。

1997: xv)。對於事件做開頭、中間、結尾的序列安排，使之具有「情節」(plot)，正是敘事最重要的特徵，亦即「情節賦予」(emplotment)是使事件的陳述具有敘事性(narrativity)的最重要關鍵。情節的賦予把事件轉變成連續故事中的一幕(episode)，使獨立的個案具有意義，也因而將敘事的各部分聯繫起來，成爲一個具有內在意義的整體。不過爲了尋求秩序與意義，在安排清楚的事件開頭、中間、結尾的情節賦予過程中，敘事並非簡單地反映現實，而是包含了選擇、重組、簡化現實等機制(Hinchman and Hinchman 1997: xvi)。針對上述這些敘事的基本性質，Margaret R. Somers 與 Gloria D. Gibson 因此指出：「特別與社會科學相關的一種重新概念化之敘事性」的四個特徵是「部分的相關性」(relationality of parts)、「具有因果關係性質的情節賦予」(causal emplotment)、「選擇性的取用」(selective appropriation)、以及「時間性、序列、與地點」(temporality, sequence, and place)，並且將敘事進一步定義爲「深植於時間和空間中，而由具有因果關係性質的情節賦予所構成的一群關係（互相關連的許多部分）」(Somers and Gibson 1994: 59; 參見 Maines 2001: 177)。

就本文的目的而言，上述的敘事重新概念化，在兩方面最爲重要。第一、敘事重新概念化的基礎，在於許多研究者體認到敘事普遍存在於人類社會，而對社會生活具有基本重要性。⁶敘事的普遍重要性，主要來自人類存在狀態所無可避免的時間面向。人們活在時間的歷程中，無時無刻不關連到時間來經驗與詮釋其生命。不過實際上人們體驗時間的方式，往往不是在感受秒、分、小時、日、月、年等一連串的時刻單位，而是以一種處身於現在而對過去與未來的覺察在經歷時間。敘事正展現人類這種對時間的特殊經驗方式，而與敘事性的時間意涵最相關的，即爲情節 (Ricoeur 1984: 52; 同時參見 Ricoeur 1980, 1981: 165, 167; Richardson 1990: 124-125)。換句話說，敘事將人類的經驗組織成在時間上具有意義的一幕又一幕，是一種重要的認

6 參見經常被徵引的 Barthes (1977 [1966])，尤其是 p.79。

知方式 (Polkinghorne 1988: 1)。而有如上述，敘事創造意義的方式，是將經驗或事件納入特定的情節，使它成為別的經驗或事件的原因或結果，也因此成為更大的一個關係整體之一部份。⁷就像 Laurel Richardson 所強調的，敘事中事件的意義，取決於它在整體中的時間位置與角色；以敘事的方式回答「某事的意義為何？」，就在於顯示這件事如何貢獻於敘事最終的走向 (Ricoeur 1981: 277; Richardson 1990: 118)。

上述重新概念化的敘事與本文目的密切相關的第二點，是它對認同和行動研究的重要性。情節賦予既是敘事性的要件，換句話說，是情節才使得故事具有某種方向，將其各部分搏聚起來，使涉入其中的人們感受到某種完整與一致性。情節之所以可以使故事不至於漫無旨歸，就如 Eric Ringmar 強調的，在於情節有一種「問題意識」 (*problématique*)，或者說一種基本的緊張、衝突。這種緊張與衝突需要紓解，因此需要故事所涉及的行動者(actor)採取行動(action) (Ringmar 1996: 72-73)。Ringmar 以情節所展現的故事方向為中心，扼要地說明敘事、認同、與行動的關係：

從故事的參與者的角度而言，敘事有其方向性(directedness)，可以從行動的意圖的(intentional)面向來理解。做為一個有意識的人，就是有其意圖與計劃——也就是試著要促成某種結果，而意圖與其實行之間的連結，一向以敘事的形式來呈現。因此說故事(story-telling)變成行動的前提……。我們告訴自己我們過去是／現在是／將來會是怎樣的一種人；我們過去／現在／將來會處在什麼情境；像我們這樣的人在這些特殊的情形下，可能會怎麼做。(Ringmar 1996: 73)

7 Ricoeur 因此將情節定義為「任何故事中支配一系列事件之可理解的整體」(Ricoeur 1980, 1981: 167)。筆者在此並非假設人們以敘事來尋求世界的秩序與意義，必然都是成功而穩定的。關於這一點，參考 MacIntyre (1984: 218-219)。同時參見下文的討論。

換句話說，我們不只說故事，故事也總是有自我反身的(*self-reflexive*)與超乎虛構的(*metafictional*)面向，因而訴說著我們。人類社會到處存在著故事，而人們自己也往往身在所傳述的故事中。人們訴說的故事與他們對「我是誰?」、「我要成爲怎樣的人?」、「什麼是有意義的生活?」、「我應該怎樣追求這種生活?」、「我的生活目的與利益何在?」等一連串和自我存在與自我實現相關之問題所提出的答案之間的關係，亦即敘事與認同之間的關係，可以說是「過程的」(*processual*)。兩者既相互構成，又互爲條件而相互限制，沒有哪一個是先驗存在的。主體性與敘事性可以說互相糾纏，彼此建構(De Lauretis 1984: 149; Somers and Gibson 1994: 61; Bennett and Royle 1999: 54)。如此從分析的敘事概念來理解人們的認同與行動，強調故事與自我、敘事與認同(以及與相關的利益、行動)、敘事性與主體性之間的過程的、辯證的關係，因而形成「敘事認同」(*narrative identity*)的理論取向(Somers and Gibson 1994: 64-73; Ringmar 1996: 73-78; Hinchman and Hinchman 1997: xix; Whitebrook 2001: 4, 9-10)。

(二) 敘事認同與本質論及工具論

就本文探討七〇年代黨外關於日據時期台灣人抗日的歷史建構而言，敘事認同的概念與理論取向的一個主要優點，在於它有助於避免兩種常見的對於認同與行動的不恰當理解：本質論的(*essentialist*)，以及工具論的(*instrumentalist*)。⁸ 首先，本質論指的是一種理解認同的觀點，認爲它是做爲人們自我的核心而穩定地存在著，是自我的「本質」(*essence*)，是可以被發現的一種實在的東西(*thing*)。從這樣的看法出發，各種社會人群的分類範疇，譬如女性、男性、客家人、西方人等，都被假定有其固定的本質(Barker 2000: 166)。在關連到理解人們

8 筆者在這裡將本質論與工具論放在一起討論，並非暗示它們都涉及同一個分析層次，而只是因爲本文以下討論的目的，特別是為了說明敘事認同觀點的反本質論、反本質論有可能與工具論的不當「接合」(*articulation*)、以及敘事認同理論如何避免這種不當的接合。

的行動時——亦即在解釋人們為何以特定的方式行動時，認同的本質論傾向於認為：處在類似的社會人群分類範疇、因而具有類似生命經驗的人們，會由於共同的性別、族群、階級、世代等特徵而行動。本質論在理解認同與行動上所遭遇的主要批評之一，是不恰當地假設單一的經驗範疇會完全凌駕、取消與之交錯的其它社會身分所帶來的差異，因而片面、必然地決定行動。另一個問題是：如果激發行動的力量來自於本質的、固定的、從既定特徵界定的範疇，那麼基於這樣的認同概念，如何而可能去宣稱社會能動性(*social agency*)的存在？如果認同是固定的，那麼人們如何而可能適應不斷變遷的權力關係或歷史(Somers and Gibson 1994: 52-57)？從能動性與結構的角度來看，本質論並未對兩者之間的關係，抱持著辯證的、過程的看法。⁹

相對地，敘事認同的觀點在理解認同、行動、與能動性上，其基本出發點，可以說是反本質論(*anti-essentialism*)的。這種反本質論，我們可以借用 Anthony Giddens 對於自我認同(*self-identity*)、反身性(*reflexivity*)、與敘事的關係之討論來加以說明。對 Giddens 而言，自我既然很難說是具有固定形體的現象，那麼自我認同也並非指持續不變的物體或實在的東西。自我認同不是既定的東西，不是個人所擁有的某種或一群特徵，而是「必須在個人的反身性的活動中重複不斷地創造與維持的某種東西」(Giddens 1991: 52-53)。Giddens 因此將自我視為「個人所負責進行的反身性的計畫(*a reflexive project*)」。Giddens 進一步指出，這種反身性的自我理解、定位、以及追求自我實現，都涉及個人對時間的控制或「與時間的對話」。然而這種與自我認同建構有關的時間經驗，通常與鐘錶等普遍標準化計算的時間秩序少有關連，而是個人以現在的情境為中心，鑒於對未來的期望而篩選其過去，以取用過去(Giddens 1991: 71-72, 74-75)，就如本文前面所提到的

9 關於本質論傾向的研究，在性別方面，如 Chodorow (1978)與 Gilligan (1982)，參見 Scott (1988)的批評；在階級方面，傳統馬克思主義對工人運動的觀點是經常被舉出的例子，參見 Calhoun (1993a)的批評。在族群或民族方面，如 Shils (1957)、Geertz (1963)、Isaacs (1975)、Reynolds et al. (1987)、Shaw and Wong (1989)、Van den Berghe (1995)。

我們在日常生活中實際經驗時間的方式一般。換句話說，自我做為反身性的計畫，對個人而言，形成了「一個從過去到預期的未來的發展的軌道」；而自我認同則是「做為被人根據他或她的傳記(biography)來反身地理解的自我」。對 Giddens 而言，要發展與維持整合的自我認同感，就需要一個關於自我的敘事(Giddens 1991: 53, 75-77)。從上述 Giddens 關於自我認同的討論來看，我們可以說，個人的能動性就反映在其足以反身性地發展一種關於自我的敘事之能力。事實上，我們甚至可以說，構成 Giddens 在這裡所謂的反身性的核心，正是一種建構敘事的能力，¹⁰亦即一種說故事的能力——藉著這個故事，個人將自我的過去、現在、未來連結在一起，並且將自我與更大的社會與歷史聯繫起來，或隱或顯地向他人與自己展現自我利益所在與行動方向。認同所涉及的能動性的基礎，就在這種反身性的思考與實踐。範疇性的認同(categorical identities)——亦即個人所屬的社會人群分類範疇，如果有其形塑利益認知與催發行動的力量，也必須經過特定的敘事的中介、磋商(negotiated)、與再建構，才能有條件地達成，而不是一個必然的結果。因此 Chris Barker 基於 Giddens 的討論，認為：「認同是一種關於反思我們自己的思考模式(a mode of thinking about ourselves)」(Barker 2000: 167)。對個人而言，這種反思自我的活動之所以必要，正在於時空情境的與時俱變，必須調整現在的決定與未來的期望，因而這種思考模式也隨之改變。

討論到這裡，我們不難理解：構成族群性(ethnicity)與民族主義研究中所指的「原初論」(primordialism)——亦即認為族群性與民族性(nationality)是固定的、根本的、源自於個人無可改變的出生背景(Cornell and Hartmann 1998: 48)——的基礎，正是不恰當地對於認同、行動、與能動性做一種本質論的假設。事實上就像 Craig Calhoun 所指出

10 Giddens 的這個意思，在他的 *Modernity and Self-Identity: Self and Society in the Late Modern Age* 一書末尾所提供的概念解釋中，表達得更清楚。他將「自我的反身性的計畫」定義為「反身性地安排自我敘事(self-narratives)而形成自我認同的那種過程」(Giddens 1991: 244)。

的：族群性與民族主義兩者，都是政治的與社會的鬥爭中，菁英與其他參與者所激發而倚賴的一系列現代的範疇性認同之一部份(Calhoun 1993b: 235)。¹¹

不過在認同與行動的理解上，這種反本質論的觀點，亦即對情境變遷中反身性的作用與再建構自我敘事的能力——以及涉及其中的利益認知與行動方針的自我調整——的強調，一個可能值得警惕的地方，是必須避免不恰當的工具論意涵。¹² 這裡所謂的工具論，就像它在一般社會科學中的意義一樣，指的是一種信條，認為思想觀念主要必須從它們對其受惠者的效用、益處來解釋，而不是從它們對於真相或真實的正確再現來解釋(O'Leary 2001: 148)。換句話說，從這種觀點來理解情境變遷中人們反身地建構與再建構自我敘事的現象，強調的是自我敘事對行動者的效用與益處，而非它對行動者真實的認知與情感的表達或再現。如同 Brendan O'Leary 所認為的，工具論對於像民族主義之類的認同與行動的解釋，在某種意義上並沒有錯，因為如果對涉身其中的人們毫無用處，它們不可能會繼續維持與發展。不過他也指出：大部分工具論對認同與行動的理解，其推論遠超過這種既安全卻又無趣的宣稱，而變成一種過度化約的看法(O'Leary 2001: 148)。¹³ 在理解自我敘事與認同建構上，工具論的化約傾向，主要在於不恰當地假設人們基本上是一個理性的行動者，總是能夠明白自己「真正的」利益(interest)所在，隨時能清楚地分辨為了理性地獲取特定利益所建構的敘事中表達的自我與「真實的」自我，並且維持這種區別，不致於混淆錯亂。筆者認為，個人的或集體的（如國家、社會運動

11 誠如 David Brown 在最近的書中指出的，的確很少有談論族群與民族主義的作者明白提出其原初論的解釋，而這使得像 Rogers Brubaker、John Armstrong 等學者認為原初論的研究取向早已消逝，或是與目前族群與民族主義的議題不相干。然而就像 Brown 認為的，很少人明白提出原初論的解釋，不代表其相關假設的影響力式微(Brown 2000: 6, 168, Note 3)。另外，原初論本質的、範疇的思考傾向，就像一些研究者指出的，仍然無意識地形塑眾多日常生活對族群與民族主義現象的理解與討論(Calhoun 1993b: 235; Cornell and Hartmann 1998: 49)。討論那種理解族群與民族主義的原初論之所以仍有其重要性，理由之一，就在於對認同與行動的本質論理解，至少在一般大眾日常生活的知識建構中，同時也在政治社會的鬥爭中，仍扮演重要的角色。

12 筆者在這裡強調這只是可能的，而非必然的理論邏輯發展。參見筆者下文的討論。

13 與本文較為相關的是工具論傾向的民族主義研究，這方面的文獻見 O'Leary (2001)。

等) 行動者在某些時候或某些情境, 會如此理性地計算利益、高度自我監控, 雖然不是不可能, 但我們恐怕很難想像人們如何而可能隨時隨地、長久地以這種方式行動。換言之, 人類固然是能夠進行反身性活動的動物, 但是工具論的基本困境, 則在於其所理解的行動者是「過度反身性的」(over-reflexive)。

工具論的「過度反身性的行動者」之假設, 雖然是從強調情境影響、反身性活動、調整自我敘事的能力等的反本質論出發, 但事實上反轉地又假設了一種本質性地存在的自我。這種假設的更真實的自我, 能夠隨時理性地計算真正的利益與成功地自我監控。然而從敘事認同的觀點來看, 既然自我是個人以安排敘事而不斷進行的反身性計畫, 而故事與自我、敘事與認同 (以及與相關的利益、行動)、敘事性與主體性之間的關係, 是相互辯證、沒有哪一個是先驗的存在, 那麼工具論中隱含的二分法——亦即本質的、真實的自我 (以及伴隨它的利益、行動方針) 相對於敘事的、工具性的自我 (以及伴隨它的利益、行動方針) 的區別, 可以說是不恰當的。正如 Ringmar 所指出的:

……不要再問到底哪一個真的存在、哪一個真的不存在; 一旦我們要尋找「真正的自我」, 我們就沒辦法找到它們。
……所有關於「存在」("being")的問題, 事實上都是關於「做為什麼而存在」("being as")的問題。我們永遠沒辦法確定地回答我們——或任何其他他人亦然——「真的是」什麼, 但是這一點也不妨礙我們討論我們或是別人像什麼 (what we or others are like)。我們認為我們是什麼, 這個問題, 並不是在問到底是什麼本質構成我們, 而是在問我們將哪一種隱喻(metaphors)運用在我們自己身上。這個問題, 是關於我們如何看待我們自己, 關於我們用來談論我們所看到的東西的那些故事。(Ringmar 1996: 75)

換句話說，脫離人們關於自我的敘事而要尋找一種真正的、本質的自我，恐怕是徒勞無功的想法。進一步而言，也只有以敘事認同的觀點理解行動者關於認同的敘事，我們才能夠對利益這個概念與行動者的性質有比較恰當的認識。「因為除非在一個敘事的脈絡中，否則行動沒辦法讓人理解、也沒有意義，所以在故事之外，沒有所謂的利益存在，只有做為我們談論自己的故事中的那個人物而存在，我們才可以說對做這件事而不是另一件事有利益、或者無利益」(Ringmar 1996: 73)。再者，如果敘事的方向呈現敘事者的意圖，說故事成為行動的前提，那麼從敘事認同的觀點來看，在瞭解行動者的性質上，如果就本體論的層次追究哪一種行動者才真的存在，哪一種真的不存在，恐怕不是最切要的問題。至少，筆者認為，這不會是在分析上能夠帶來明顯成效的(analytically fruitful)問題意識。在這一點上，Ringmar進一步正確地指出：

我們根本不可能說一個行動者「就他、她或它的本質而言」("in him-, her- or itself")到底是什麼，因為只有當他、她或它在行動的時候，或者是在準備要行動的時候，或者是在已經行動的時候，才可以說他、她或它存在。一個行動者不是一個人或團體「真正是」("really is")什麼的那種東西，因為行動者只存在於他們用來談論自己的敘事中，或者說只存在於別人用來談論他們的那些敘事中。行動者只存在於故事中，而不在別處，並且故事是受敘事學的(narratological)、而非本體論的要件所支配的。(Ringmar 1996: 75)

綜合而言，在理解自我、認同、利益、行動、與社會能動等議題上，相較於帶有本質論或工具論的傾向，我們可以說，敘事認同取向最主要的優點，在於它挑戰了社會學與日常生活中常見而錯誤的二分法。這種二分法，如同 Somers 與 Gibson 指出的，將行動的理念的(ideal)意義與工具性的(instrumental)意義對立起來；並且認為只有當行

動是表意的(expressive), 而非工具性的, 才是真實的(authentic)。反之, 敘事認同的觀點強調認同建構與行動究竟屬於表意的或理念的, 或相對地屬於工具性的, 並非是自明的現象(Somers and Gibson 1994: 71-72)。許多認同建構與行動, 通常不容易簡單清楚地歸類為屬於哪一種目的。與此相關的, 亦即敘事認同取向反對以先驗的範疇來詮釋行動。換句話說, 人們通常不是簡單地基於我們所認為某種社會人群分類範疇代表的利益與價值、或是單純地由於理性的手段/目的之偏好而行動, 而是由於他們認同某種故事、將自己置放在特定的敘事中。從敘事認同的角度來看, 人們以特殊的方式行動, 是因為如果不這麼做, 就會違背他們在特殊時空中建構的敘事所賦予的存在感。至於在另一種時空情境或不同的優勢敘事脈絡中, 那種存在感可以完全地不同(Somers and Gibson 1994: 67)。因此筆者認為: 敘事認同的理論取向可以說是一種「非工具論的情境論」(non-instrumentalist circumstantialism, non-instrumentalist situationalism)或「非工具論的建構論」(non-instrumentalist constructionism), 可以使我們較恰當地理解自我、認同、利益、行動、與社會能動等議題。

本文的重點, 就在藉助敘事認同的理論發展, 從非工具論的情境論或建構論的觀點, 探討國民黨統治體制下成長與受教育之戰後世代的黨外成員, 在七〇年代的特殊歷史情境中, 如何建構一種以中國民族主義為藍本、而又有別於國民黨所教化者的歷史敘事。分析的焦點在於他們如何以這種歷史敘事, 將自我與社會、國家、民族聯繫起來, 建構其個人存在的意義、世代集體認同、以及政治社會改革行動的方向。在本文中, 敘事認同的概念與理論做為啟發的工具(heuristic tool), 用以闡明上述的經驗現象; 同時這個經驗現象的分析, 也用來支持這樣的理論觀點。¹⁴ 本文在最後也指出: 黨外成員一方面以中國

14 本文審查人之一曾舉出「敘事者不能自由說話」或同一敘事者具有「多重或衝突矛盾的敘事」, 亦即敘事與認同、行動可能不一致的情形, 以此質疑敘事認同理論的有效性。然而面對這一類情況, 在經驗上要判別哪個敘事才能代表敘事者的認同, 不是敘事認同理論做為理論所能達成、或所欲達成的。它不在解釋哪個敘事為真, 哪個敘事為偽。理論本身既沒有這種能力, 而我們也不應期望有哪一種理論具備這種自動判別

民族主義歷史敘事來理解台灣的過去，將他們原本被教化的中國民族／國家認同加以充實、具體化，另一方面他們強調台灣鄉土歷史與文化，則有助於美麗島事件後、八〇年代初以降黨外的台灣意識、台灣民族主義的政治動員與文化建構。對台灣七〇年代以來迄今的文化發展與民族／國家認同政治變遷之關係，尤其涉及八〇年代以來台灣文化民族主義發展與七〇年代的歷史聯繫，本文的分析提供一個較完整的歷史圖像，以及具有理論意涵的分析理解。

三、黨外、戰後世代、與歷史敘事

(一) 康寧祥的開端：做為中華民國歷史財富的台灣人抗日史

從二二八事件與五〇年代初期的「白色恐怖」政治肅清之後，到1970年代不到20年的這段期間，曾經以集體而顯著的公開方式挑戰國民黨威權統治與文化意識型態的，大致上只有《自由中國》(1949-1960年)與《文星》兩雜誌(1957-1965年)及其成員。從《文星》被國民黨強迫停刊到1960年代結束的這幾年間，對國民黨威權統治僅有的挑戰，則大致只剩本省籍地方民意代表如郭國基、李萬居、郭雨新、許世賢等零星的言論批判(李筱峰1987: 89-90)。不過這種情形到了七〇年代開始轉變。1969年底，比郭國基等人年輕一代的本省籍的黃信介(1928-1999)與康寧祥(1938-)，在改制後的台北市第一屆市議員選舉與中央公職人員國代、立委補選中，分別當選市議員或立法委員，成為七〇年代台灣「黨外」反對政治運動的開端。此後隨著地方與立委、國大選舉的輪替舉行，反國民黨的政治異議份子逐漸凝聚。七〇年代黨外反對運動於是逐漸壯大，而黃、康兩人至少

史料與經驗之性質的能力。敘事認同理論固然在強調敘事與認同、行動的內在密切關係，但沒有假設同一位敘事者的任何敘事必然與其認同、行動有一致的關係。它開始介入經驗現象的詮釋，是在研究者判別史料與經驗現象的性質之後，亦即在判別哪些敘事比較接近敘事者的認同之後，敘事認同理論才開始有其作用。

在 1977 年底前，一直共同扮演領導、協調的角色。¹⁵

七〇年代的黨外人士普遍具有強烈的「歷史感」。這裡所謂的歷史感，指的是一種思考的傾向，這種傾向將自我的存在、自我與社會的關係、社會行動的選擇等納入一個特定的歷史敘事來理解，而在這個歷史敘事中尋求自我、自我與社會的關係、社會行動等的意義與方向。至於這裡所謂「特定的」歷史敘事，指的是這個歷史敘事必然是從特定主體位置以認識過去、現在、與未來的過程與結果。我們可以說，構成個人的或集體的行動者之歷史感的核心，是一個特定的歷史敘事。綜合而言，當時黨外人士的歷史感表現在：第一、對世代身分的強烈自覺；以及第二、對台灣歷史的強烈關懷，尤其是對日據時期台灣人反抗殖民統治的政治社會運動史的興趣。這兩方面，都鑲嵌在更大的、基於中國（民族）認同的歷史敘事而展現出來。如此特殊的歷史感，是他們戰後世代身分與七〇年代政治社會情境互動的產物。

當時黨外人士上述兩方面的特殊歷史感，首先在康寧祥身上初步展現出來。1972年6月，蔣經國就任行政院長，開啓國民黨由蔣中正到蔣經國的權力交替階段。同年底，康寧祥以台北市議員身分投入增額中央民意代表選舉，於台北市以次高票當選為立法委員。1975年3月，康寧祥針對蔣經國在立法院的「施政方針及施政報告」提出質詢，首先談到台灣面臨國際局勢變化，尤其是退出聯合國、與日本斷交、美國可能即將與中共建交等，已使中華民國的國際承認減少，「法統」備受威脅。其次，他談到國內環境變化，批判當時僅佔台灣3.2%人口的65歲以上老人壟斷政治領導階層，卻又逐漸凋零；而高居全人口87.8%的，則是戰後「20幾年來，在全世界智識爆發和科技突飛猛進的環境下長大成人」的49歲以下的世代。他因此要求國民黨當局必須認真看待「這一群中華民國未來命運的決定者」，重視他們對世界與台灣社會、對中華民國前途的看法與主張。¹⁶ 在呼籲國

15 參見李筱峰(1987: 138-147)。

16 《立法院公報》64(19): 8 (1975年3月5日)。

民黨當局不能再以不變應萬變時，康寧祥提出四大政治變革主張。除了要求國家預算應符合台灣社會實際所需、制訂「政黨法」以利在野黨成立、與地方政制法治化之外，他強調國民黨當局應「重新確認台灣『歷史文化』的價值和地位」。在陳述鄭成功以台灣為反清復明基地而展現「先民矢志復國之志」、甲午割台之初台灣民眾的武裝抗日與犧牲之後，康寧祥特別強調後來受威爾遜總統的民族自決主張、中國五四運動等影響，而以蔡惠如、林獻堂等為先導的抗日政治運動，並進一步簡述「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台灣文化協會」、「台灣民眾黨」、與「台灣地方自治聯盟」的歷史。對於台灣民眾的抗日史，康寧祥認為須有兩點認識：第一、日據時期台灣人受日人欺壓而痛苦犧牲，「並不下於大陸同胞八年抗戰之苦」；第二、當時抗日民族運動奮戰不懈，「思慕祖國」的心志，是台灣人抗日的最大憑藉。¹⁷因此他主張將「中華民國歷史文化的珍貴財富」的台民抗日史跡編入歷史教科書，讓本省籍學生知道先人曾為「思慕祖國，民族尊嚴」而抗日。他認為，確認台灣歷史文化的價值和地位，就是對台灣人民因「思慕祖國，民族尊嚴」而犧牲的敬重，也可以激發全民「愛鄉土、愛民族、愛國家」，使其生命與國家命運密切結合，有助於國家民族的前途發展。¹⁸

和此後黨外人士所逐漸發展而更為鮮明的歷史感比較，康寧祥這次質詢強調戰後世代在台灣現在與未來應該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以及指出台灣歷史文化的重要性，可以隱約看出他做為七〇年代黨外運動先驅之一，多少將自我角色的定位及投身反對行動的選擇，與戰後世代身分的自覺和對台灣歷史——尤其是日據時期台灣人抗日政治社會運動史——的關懷聯繫起來。康寧祥這次的質詢，代表當時黨外對戰後世代身分的自覺，以及重視日據時期台灣人抗日政治社會運動史的開端。

17 《立法院公報》64(19): 9-13 (1975年3月5日)。

18 《立法院公報》64(19): 13-14 (1975年3月5日)。

康寧祥將台灣的過去——特別是台灣人抗日史——視為一個中國民族主義歷史敘事情節的一幕（或幾幕）。這種情節賦予的方式，意味著台灣人抗日史的意義必須從做為這個敘事整體的一部份來理解。就像七〇年代戰後世代的文化界人士提倡的「回歸現實」或「鄉土」的理念一樣，這種歷史意識將台灣的鄉土歷史經驗納入上述的歷史敘事中，成為其敘事「情節」的一部份。這種覺醒與努力，一方面強調台灣歷史經驗的特殊性，另一方面則在尋找與確認其「中國性」(Chineseness)，使其在公共領域獲得承認。相對於戰後國民黨的教化與意識型態控制，當時企圖回歸現實或鄉土的戰後世代成員關於台灣歷史經驗的集體記憶建構，可以說是「改良主義」的(reformist)。而這正和當時戰後世代的社會政治變革主張一樣，都是在中華民國體制內所進行的革新要求（蕭阿勤 2002: 203-204）。到 1979 年的美麗島事件為止，台灣政治反對運動人士做為「忠誠的反對者」，其主要訴求是「民主化」（王甫昌 1996: 155-165）。就省籍問題而言，當時從《大學雜誌》、黨外運動以來，涉及省籍的社會政治革新主張，是在體制內要求本省人的公民身分被充分承認、獲得平等的公民權與政治權（蕭阿勤 2002: 203-204）。從康寧祥在質詢中強調明鄭以來先民矢志復國、台灣民眾思慕祖國、堅持民族尊嚴而抗日，以及認為台灣人受日人統治的痛苦不下於大陸同胞八年抗戰之苦，而這些應成為中華民國歷史文化的珍貴財富等，我們可以看出中國民族主義歷史敘事模式的作用，以及體制內改良主義的集體記憶建構。

與當時文化界對日據時期台灣新文學的熱烈探索相比較（蕭阿勤 2002），康寧祥在質詢中對台灣人抗日政治社會運動史的公開強調，已經是較為晚出的。然而其質詢的特殊與重要之處，首先在於涉及了比文學發展更具政治敏感性的政治社會運動；其次，這恐怕是台灣戰後第一次由政治異議人士在中央民意代表機構正式向國民黨最高權力當局直接提出這方面的批評與籲求。然而這兩方面的政治敏感度，以及對國民黨意識型態的挑戰性，實際上都因康寧祥陳述中的中國民族主義歷史敘事與體制內的改良主義而大大降低。這種關於在台灣的

「中國人抗日史」的集體記憶重構，就某種程度而言，反而有助於國民黨關於中國認同、反攻復國的意識型態教化與控制。當時國民黨政府面臨嚴重的外交挫折，加上海外台灣獨立運動顯著發展，都威脅到國民黨的統治正當性與中國認同、反攻復國的意識型態，而台灣社會也普遍瀰漫著危疑不安的氣氛。在這種情況下，康寧祥以台灣歷史文化來激發全民愛鄉愛國的說法，未必不受國民黨政府歡迎。事實上蔣經國在答覆康寧祥質詢時，隨即肯定這一點而「非常贊同」他的提議，準備把台澎同胞的愛國歷史編入教科書，使青年知道當年先人如何反清與抗日，而目前更肩負更大的「反共復國的神聖任務」。¹⁹

康寧祥由於個人成長過程的特殊機緣，早在步入政壇之前，就已認識一些曾親歷日據時期的年長世代成員。²⁰ 由於這些年長世代的台灣人知識份子對他親述日據時期的經驗，而他也因此得以閱讀坊間難以接觸到的關於日據時期的文獻，因此與其他一般戰後世代成員比較，康寧祥對日據時期歷史，早有相當程度的熟悉。²¹ 事實上，早在1969年底黃信介參加中央公職人員國民大會代表與立法委員增補選時，康寧祥在為其助選的一場台北市政見發表會中，就曾以日據時期的蔣渭水與「台灣文化協會」歷史為開場白，闡述蔣渭水以身為台灣人為榮與改革日據下台灣社會之精神。²² 1972年底，康寧祥本人參加增額中央民意代表選舉，於台北市競選立法委員。在國立台灣大學校門口的一場宣傳演講中，也曾從該校原為「台北帝國大學」的歷史談起（鄭鴻生 2001: 180-181）。²³ 1977年夏，當回歸鄉土現實潮流中對

19 《立法院公報》64(19): 19 (1975年3月5日)。

20 康寧祥訪問錄音（訪問者：周婉窈、蕭阿勤，時間：2002年1月18日約3:10至4:10，地點：監察院康寧祥委員辦公室）。

21 康寧祥訪問錄音（同上註）。七〇年代中期，康寧祥曾在一次黨外人士所舉辦紀念蔣渭水的座談會中，提到他這方面的特殊成長歷程。他說：「我對蔣渭水先生的了解，可以說全然得自前輩的傳說，以及書上所記載的。我個人從小對台灣史，以及有關台灣史的傳聞，就很喜歡閱讀……」。見〈紀念革命先賢蔣渭水先生逝世46週年座談會〉，《這一代雜誌》2: 59 (1977年8月)。

22 見〈紀念革命先賢蔣渭水先生逝世46週年座談會〉，《這一代雜誌》2: 60 (1977年8月)。在這場座談會中，康寧祥也提到，這是他當時為黃信介助選時「最得意的一場政見發表會」。

23 當時還是台大學生的鄭鴻生後來追憶說，康寧祥這種回顧台灣大學歷史的視野，「在

日據時期歷史的重新探索已趨熱烈時，在一次黨外人士所舉辦紀念蔣渭水的座談會中，康寧祥則提到自日據時期與戰後以來的政治人物中，蔣氏是他認為最傑出而值得敬佩的一位。回顧他自 1969 年以來八年的從政生涯，康寧祥認為「其中的原動力得自於蔣渭水先生的太多了」；而他「在歷來的競選運動中，有不少的言論取之於蔣渭水先生的政見」。²⁴

康寧祥與年長世代的台灣人知識份子的接觸、對日據時期歷史的熟悉、以及在競選活動中的言論，象徵日據時期台灣人政治社會運動與七〇年代戰後世代成員為主的黨外政治反對運動的一絲微弱的連繫。這種微弱的連繫，具體表現在黃信介、康寧祥、與張俊宏(1938-) 等人在 1975 年 8 月合作創刊而在年底被禁的五期《台灣政論》上。這份僅有五期的七〇年代第一份黨外雜誌，其中四期分別都出現一篇探討日據時期歷史的文章（見表一）。這四篇文章所討論的，都是 1920 年代開始受西方近代政治社會思潮與中國局勢等影響，而以蔡惠如、林獻堂等人為先導的抗日政治社會運動與人物。其中一篇譯自台灣總督府的《警察沿革志》，涵蓋了工、農運動與台灣共產黨。此外，其它三篇的作者均為曾經追隨林獻堂而參與政治社會運動的葉榮鐘（「凡夫」為其筆名）。在這些文章中，葉榮鐘分別回顧所謂「祖國派」的蔡惠如、「與祖國派的思想傾向並無二致」的林幼春、與「不是祖國派」而對祖國的關心、「對於革命的嚮往與對國父的崇拜，比任何人都來得更加熱烈」、「在當時民族運動的領袖中可能找不到第二個人」的蔣渭水（葉榮鐘 1975: 56; 凡夫 1975a: 69, 1975b: 77-78）。葉榮鐘一方面對這些祖國派人士反抗殖民統治、堅持民族精

1970 年代初期可是相當令人震撼」，使當時的他及同伴「為之動容」，「讓人直覺有如蔣渭水再世」（鄭鴻生 2001: 181）。張俊宏在 1977 年也曾提到康寧祥「在遠東劇場和台灣大學門口的演講中，提到『台灣歷史的使命感』做為他競選的主題，這使黨外群眾運動加入了承繼歷史使命的高貴感，引起了相當大的衝擊力量，將黨外的群眾運動提升到一個新的境界」（張俊宏 1977a: 192-193）。康寧祥這次以台北市的次高票當選。參見下文的討論。

24 見〈紀念革命先賢蔣渭水先生逝世 46 週年座談會〉，《這一代雜誌》2: 59-60（1977 年 8 月）。

神的言行極其推崇，一方面在談到以東京的台灣留學生為起始的祖國派，卻也有微詞，認為他們把一切的希望都寄託在祖國的將來，其「理論未嘗不對」，但卻「不無逃避現實的嫌疑」（葉榮鐘 1975: 56）。葉榮鐘從《台灣政論》第一期即為其撰稿，顯示黃信介等人在創刊初始就有意介紹台灣歷史給讀者，尤其是日據時期台灣人政治社會運動史。²⁵ 葉榮鐘既推崇祖國派，而又批評其不重視台灣現實的態度，事實上符合《台灣政論》一方面「為了濃烈的愛國心」、「為我們的民族建立一點磊落的性格」而論政，另一方面則要求國民黨重視台灣現實與命運而企圖「匯聚廣大民眾的意見，使官方與民間的反應得以交流配合」的溫和改良主義。²⁶

表一 《台灣政論》（1975.8-1975.12）涉及台灣日據時期歷史的文章

序號	作者	篇名	出版年月	卷期	頁數	備註
1	葉榮鐘	台灣民族運動的鋪路人 蔡惠如	1975.8	1	57-58	在「人物介紹」專欄下刊行
2	凡夫	台灣民族詩人林幼春	1975.10	3	66-69	在「人物介紹」專欄下刊行
3	正宏(譯)	日本人眼中的台灣抗日 運動	1975.11	4	48-52	譯自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志》第二篇（中卷）
4	凡夫	革命家蔣渭水	1975.12	5	76-79	在「人物介紹」專欄下刊行

（二）投入政治反對運動的戰後世代：世代身分的自覺與中國民族主義的歷史敘事

不過黨外後來致力於探索與宣揚台灣史，尤其是日據時期台灣人政治社會運動史，匯聚為七〇年代回歸鄉土文化潮流的一部份，不是透過康寧祥與親歷日據時期反抗活動的年長世代接觸之結果。這種發

25 《台灣政論》第一期中的〈編者的話〉，說明葉榮鐘「以他古稀之齡一聽到有這本雜誌，立刻熱烈的答應長期為本刊寫稿，……同時本欄〔筆者按：即「人物介紹」專欄〕也希望台灣各地的耆老先進能多提供資料並賜指正。」見《台灣政論》1:4。

26 這是第一期中〈編者的話〉與發行人黃信介的發刊詞〈發行人的話：我們想做的〉所言。見《台灣政論》1：扉頁刊頭，3。

展，主要由於當時——尤其是在 1975 至 1978 年間——許多戰後世代知識份子相繼投入黨外運動，並刻意探究發揚這段歷史，以尋求他們當代行動之歷史定位。首先，在對世代身分的自覺方面，康寧祥與黃信介雖屬戰後世代，但早在六〇年代末——亦即在釣魚台事件、退出聯合國、中日斷交等震撼台灣社會的事件發生之前——就投入政治反對運動，仍屬戰後郭國基等人的世代反國民黨的一絲延續。相對地，七〇年代投入黨外的年輕知識份子，完全屬於保釣運動後台灣內外特殊歷史局勢所塑造的回歸鄉土現實的戰後世代。因此他們在某些脈絡中稱呼黃信介與康寧祥為「傳統黨外」，而與他們自己有所區別。這一點，反映了他們對其戰後世代身分的相當自覺。再者，在對台灣歷史的強烈關懷方面，他們對日據時期台灣人政治社會運動史的探索，主要不再基於與那些具有親身經歷的年長世代的接觸，而毋寧更完全出於七〇年代初歷史局勢的刺激，因而刻意回歸鄉土的過去，以尋求現在與未來行動的方針與意義。和當時文化界的戰後世代對日據時期台灣新文學的集體記憶建構一樣，黨外年輕知識份子在回顧日據時期台灣人政治社會運動時，並非依賴年長世代或他們自己個人親身經驗的記憶。當時戰後世代成員對日據時期台灣人新文學或政治社會運動的記憶建構，不是實際經驗的簡單呈現，也不是個人記憶匯聚的總和，而主要是一個歷史敘事在公共領域中將過去「模式化」的過程與結果（蕭阿勤 2002: 187-189）。

康寧祥在立法院公開要求國民黨當局重視戰後世代對台灣社會之主張與抉擇的幾個月後，一位《台灣政論》的作者如此描述這個年輕世代在國民黨統治下的經驗與感受：

我們不妨仔細的想想，單是三十八年（1949 年）政府轉進來台以後的學童有多少？他們從會唱國歌的童年起就知道三民主義，從小學選班長開始就接受民主政治的訓練，也從報紙、收音機、電視等得知民主陣容的各國民權運作的情況，他們受了教育，也服了兵役，在社會各階層服務〔，〕更納

了稅，盡了國民應盡的義務，能讓他們對眼前的政治漠然無動於衷嗎？他們看了社會百態之後不會拿來跟所讀過的憲法和各民主國家的情形作比較嗎？儘管形格勢禁或迫於生活，他們沒有多少機會去表達，然而長久鬱積於內心的怨懣和不滿終究要宣洩，發自於心、出之於口或動之以筆，歸根究底，到底孰令致之？孰令為之？（金文吉 1975: 13）²⁷

七〇年代初，這種長久壓抑的怨懣逐漸發抒出來，匯聚為以《大學雜誌》人士與黨外為主的政治社會改革要求。在往後一次又一次的選舉過程中，愈來愈多的戰後世代成員投身於黨外反對運動。在行動參與的實踐過程中，這些戰後世代成員逐漸凝聚、發展了同屬一個年輕世代的「我們」的感覺。²⁸

到了 1975-1978 年間，戰後世代的怨懣以更直接具體的方式宣洩出來，而其在反對運動中的角色也更加凸顯。從 1975 年底增額立委選舉，到 1977 年底五項地方公職人員選舉，以至於 1978 年底增額中央民意代表（立委與國大）選舉，這三次競選活動中，更多的知識青年投入黨外助選活動，或者成為黨外候選人（李筱峰 1987: 120-128；陳菊 1988: 35）。引發「中壢事件」的 1977 年底選舉結束後，戰後世代成員在台灣政治發展中的角色，隨即受到矚目。譬如當時與黨外已逐漸建立關係的黃煌雄即認為這次選舉所顯示的，除了國民黨支配角色減弱、民眾政治意識與動員力量加強之外，「最值得注意的現象之一」，便是包括候選人與選民，「完全是在現行教育體系下長大」、非傳統地方派系的「新生代」力量崛起；新生代候選人「不僅都當選了，而且都在花費最少的情形下，以超過他們起初預料之外的最高票數當選」。黃煌雄認為，在台灣政治舞台上，「這個力量在未來不僅

27 黨外或其它戰後世代成員類似的感受，見張俊宏(1977b: 3)、陳允中(1978: 59)、黃煌雄(1978a: 9)、宋國誠(1978: 3)。

28 關於當時這種參與過程與世代集體認同發展的一個生動的自白，見何文振(1946-)(1973: 39, 1978: 17-22)。

將愈放出其光芒，而且愈表現出其挑戰性」（黃煌雄 1977a: 6）。許信良在 1979 年夏也談到，「以前的黨外運動是純粹黨外政治人物參加選舉運動，基本上是個別的、地方性的」，而「這兩年來就不一樣」，黨外運動範圍擴及全台，「許多和地方勢力無關的新生代熱烈地投入運動，這不只是知識份子，還有廣大的工人、農村子弟投入」。而其中新生代知識份子的理想與目標是「整個國家社會的改革」（《八十年代》編輯部 1979: 10）。

吳乃德在 2000 年的一篇文章，討論為何台灣政治反對勢力在美麗島事件鎮壓後的八〇年代更加壯大。他認為一個相當值得分析的因素，或許是「世代政治」。雖然他指出我們到目前為止，對台灣世代政治的瞭解仍非常有限，但也推測那些未曾親歷二二八事件的恐怖氣氛、接受較高教育、普遍信仰民主理念的新世代，或許比上一代台灣民眾有較積極參與政治的態度（吳乃德 2000: 93）。雖然吳乃德針對的是八〇年代之後的情勢，但事實上這樣的一個世代，即使限於政治反對運動菁英的話，也至少在 1975-1978 年間就已具體成形，並且在當時與往後的台灣政治／文化變遷上持續扮演關鍵角色。

七〇年代初以來，具有政治社會改革意識的年輕知識份子，對於自己做為戰後世代的身分，可以說相當自覺。這種自覺，最直接表現在他們普遍以「新生代」一詞指稱自己所屬的世代位置。²⁹ 構成這種自覺的要素，是對自己所屬世代如何地異於年長世代的刻意強調，以及在公共領域的政治社會事務中所能扮演的角色之自我期許。在 1975-1978 年間投入黨外的戰後世代成員，是這個相當自覺的「新生代」的一個主要部分。1978 年底成為黨外國代候選人的呂秀蓮

29 1977 年夏由陳黎陽擔任發行人、張俊宏擔任總編輯而創刊的黨外雜誌命名為《這一代雜誌》（英文名稱為 *New Generation*）。1978 年，宋國誠與黃宗文將 16 位當時戰後世代的國民黨內、黨外重要改革人物的訪問記錄結集出版，命名為《新生代的吶喊》（宋國誠、黃宗文 1978）。這些都是這種世代位置強烈自覺的代表。1979 年夏，許信良接受訪問時，回顧其投入政治反對運動的生涯，認為他自己「七、八年來一貫努力的目的是鼓動一個新生代的政治改革運動」。當訪問者問他「你所說的『新生代』是指那些人？是怎麼分的？」許信良的回答是：「當然是按年齡分的，我所謂『新生代』就是，戰後受教育成長的一代」（《八十年代》編輯部 1979: 7）。

(1944-), 曾簡單歸納說: 「其實『黨外人士』也者, 不過一群對政治有興趣, 也有其不同見解的非國民黨籍人士, 他們希望經由民主和平的方式參與政治, 改革現狀」; 而「這群人都是在國民黨制式的教育中長大, 他們對民主的信念與為民主所作的擔當, 正是三十年來國民黨政府在台灣生聚教養的造化」(呂秀蓮 1979: 233)。這些戰後世代成員固然對國民黨統治與教育體制不滿, 批判戒嚴體制禁錮言論自由與參政權利等, 並且抨擊這些使戰後世代的心理感到挫折、冷漠、抑鬱。不過他們也普遍慶幸能在戰後台灣 20 幾年社會安定、經濟繁榮的環境中接受教育與成長, 並對這種環境與教育給予自己正面的陶冶, 感到自豪。他們經常讚頌自己所屬的新生代胸襟開闊、理想遠大、明辨是非、崇尚真理、無懼權威、正義感強烈等。這種自我推許, 是這個世代的黨外成員對自己如何異於父、祖輩的常見的典型陳述。³⁰ 當時 30 幾歲的黃煌雄, 從台灣更長遠的歷史角度談到年長世代與他們自己的不同。他說:

我習慣性的喜歡將近代史上的台灣同胞分為三輩: 我的祖父輩、父親輩, 和我們這一輩。上兩輩都經過日本人的統治以及國民黨的統治。而我們現在所看到的現象是, 老祖父輩三十年來已經成為被遺忘的一代, 他們活在暗淡的歲月裏, 不想再重提往事; 他們已經是垂暮之年, 不再有任何期待。父親輩在光復後目睹了一場大變局, 絕大多數, 特別是聰明人, 開始遠離政治, 閉口不談政治, 這是他們基於時代性的教訓所造成的。他們這兩輩幾十年來生活事實的本身, 就是很好的表白。³¹ (黃煌雄 1978a: 16-17)

30 譬如張俊宏(1977a: 6-10, 1978a: 17)、黃煌雄(1980 [1977]: 8)、吳嘉邦(1978: 13)、姚嘉文(1978: 13)。許信良的類似看法見《八十年代》編輯部(1979: 7)。至於其他人的形容, 譬如莊俊清(1977: 60)。

31 這是黃煌雄接受訪問的發言。這段引文根據的是收在其《國民黨往何處去?》一書的訪問紀錄。至於登在《這一代雜誌》的同一篇訪問紀錄(林正杰 1978), 卻沒有這一段話。

相對於父、祖輩因「二二八事件」而對國民黨政府失望、對政治社會公共事務冷漠疏離與自我壓抑，³²黃煌雄雖然感嘆國民黨統治與體制教育也帶給戰後世代類似的負面影響，但卻認為新生代畢竟有所不同：他們的共同點是「擁有現代知識武裝」，而且「有抱負、有熱情、愛打抱不平、目無權威」（黃煌雄 1980 [1977]: 8）。

進一步而言，上述對自己所屬世代的自我肯定，與其異於年長世代的刻意強調，涉及當時黨外戰後世代成員的一種特殊而強烈的歷史感——亦即涉及他們將自我的存在、自我與社會的關係、政治社會的改革主張與行動、這個世代在台灣變局中的角色等納入一個特定的歷史敘事來理解。對呂秀蓮而言，「尤其三十年來在台灣長大的新生代所受教育的普遍及完整，是中國史無前例的」（呂秀蓮 1979: 213）。張俊宏則認為：「百年來他們是中國第一批在最長久的安定中受過最完整成熟教育的一群青年」，因此「毫無疑問的，他們是近代中國最優秀的一代」（張俊宏 1978a: 17）。1978 年底的陳婉真(1950-)，當時仍為國民黨員，而且已有意「報備競選」立委，政治立場逐漸傾向黨外。張俊宏以她為例，讚揚她具有「新生代追求理想的青年們極具代表性的性格」（張俊宏 1978b: 6）。而陳婉真則從中國幾千年來「歷遭君主專制之苦」談起，期許自己「把新的精神帶進立法院，並在中國民主過程中，扮演一催化領導的積極性角色，替下一代國人搭起富強民主的偉大舞台」（陳婉真 1978: 19）。當時也參選立委的吳嘉邦，競選口號則是「替台灣民眾謀天下大利，為中華民族立千秋大計」。³³

1978 年底增額中央民意代表選舉因美國與台灣斷交而停止後，成為「黨外運動中引起爭論的核心人物」的桃園縣長許信良（《八十年代》編輯部 1979: 7），在被停職後接受訪問，總結他「七、八年來一貫努力的目的是鼓動一個新生代的政治改革運動，來取得政治上的發言權，甚至領導權」，而這是他「一貫的目的」（《八十年代》編輯

32 從黃煌雄後來類似的談話中，可以知道他在上述引文中所謂光復後的一場大變局，指的是二二八事件。見黃煌雄(1983: 30, 56-57)。

33 《這一代雜誌》15：封底（1978 年 11 月）。

部 1979: 7)。許信良進一步指出，以前黨外純粹是地方勢力，民眾不信賴，而現在民眾則支持新生代，因此他強調「這是『新生代政治運動』，這意義比『黨外運動』更大！」他批評「今天的當權者」只「享受一百多年來中國社會改革運動的成果」而無貢獻，而「我們新生代，就不同了」，是「奉獻的一代」、「解決問題的一代」（《八十年代》編輯部 1979: 10-11）。對他而言，中國近百年來的歷史昭示的是：一個優秀的民族不能沒有民主，因為它既不容別的民族壓迫，也不容「自己同胞中的少數人在政治上蔑視、欺負絕大多數人」，而「這就是我們今天應該有的認識，這就是要民主！」（《八十年代》編輯部 1979: 11）

1979年8月，黃信介、許信良、張俊宏等創辦具有黨外「機關刊物」地位的《美麗島》雜誌，象徵七〇年代以本省人爲主的政治反對運動高峰。《美麗島》核心人士，就像上述許信良的看法一樣，正是以首要目標就在民主的「新生代政治改革運動」的大力推進，來形容、理解這個發展。³⁴進一步而言，就像上述張俊宏、陳婉真、許信良等人個別所顯示的歷史感一樣，《美麗島》核心人士不僅從台灣戰後歷史來定位與理解七〇年代初以來的黨外運動、戰後世代的參與、以及追求民主等的意義，他們同時也從更綿遠的中國近代歷史角度來建構其意義。中美斷交後選舉停辦，國民黨加緊壓制反對運動，使得黨外人士對抗態勢升高。這些發展都讓政局不安、社會人心浮動，而使台灣前途更爲難測。黃信介等《美麗島》核心人士則在此時激奮地宣稱：建立民主的政治制度，「是在台灣一千八百萬人民對中華民族所能作的最大貢獻，更是我們新生代追尋的方向（黃信介 1979: 1）；對於民主的世界潮流，「一百多年來，勇敢的中華兒女沒有懷疑過這一點，所以，一百多年來中國人血淚的夢就是：民主」（美麗島雜誌社 1979a: 7）。

34 見黃信介(1979: 1)、美麗島雜誌社(1979a: 4, 1979c: 7)。《美麗島》雜誌各期目錄頁的題詞是：「培養新生代的生機，建立更合理的社會」（創刊號的第二句作「建立一合理的社會」）。

總之，至少到《美麗島》創刊前後，以本省籍為主的黨外人士，在對自己戰後世代位置的強烈自覺上，不管是強調自己所屬的世代如何異於年長世代，或是自我期許在政治社會的公共事務中扮演重要角色，都是站在一個既是台灣人，又是中國人的主體位置來思考。從民族主義政治或民族／國家認同的角度來看，當他們企圖從比較長遠的歷史角度來界定、理解自我存在的意義、自我與社會的關係、政治社會改革方針與行動、自己的世代在時代變局中的角色時，顯然依賴一個以中國民族主義為本的歷史敘事，尤其是關於中國在十九世紀中期後、近百年來抵抗外國強權、追求獨立、民主、自由發展的敘事。³⁵ 戰後世代的黨外人士在組織他們對自我與社會的經驗，使之成為更綿遠的時間之流中有意義的一幕時，有賴於將這些經驗納入中國民族主義歷史敘事，使之成為其情節的一部份，尋求其更廣大的意涵。簡而言之，當黨外人士必須向他們自己與別人訴說那些自我、世代、行動如何關係到社會、國家、民族的故事，以正當化其政治社會改革主張與行動時，那個說故事的人——亦即敘事者——的認同位置，是做為中國人、中華民族一份子的台灣人。對當時黨外人士而言，台灣人做為中國人、中華民族一份子的認同、以中國民族主義為本的歷史敘事、與在體制內要求民主的改良主義主張與行動，是處於辯證關係、互相關連之整體的各部分。

正由於在民族／國家認同層次上，當時以戰後世代為主的黨外人士仍站在中國人的主體位置，以一個中國民族主義的歷史敘事來思考、闡述自我與社會行動，因此譬如討論當時台灣的土地問題、批判國民黨政府濫加「叛亂」罪名於異己、闡釋「愛國」觀念時，都自然地溯自傳統中國的相關現象（何文振 1975: 15；姚嘉文 1979a: 61, 65；1979b: 93-94）。1977 年底五項地方公職人員選舉既是台灣戰後地方自治以來規模最大的一次，也被形容是「中國歷史上最具有深遠意義的一次選舉」（黃煌雄 1977a: 6）。又如康寧祥等人創辦的八十年代

35 關於這個敘事的要素，參見蕭阿勤（2000: 92，表一）的分析。

出版社編選《「自由中國」選集》出版，其揭櫫的用意，在於「審視過去的歷史，默想著現在的情境」，而體認到「決定中國未來的道路和中國人未來的命運」將是人民大眾的權利（八十年代出版社編輯部 1979: 11）。《美麗島》雜誌社在發表「雙十國慶感言」時，則呼籲國民黨當局「以加速改革來紀念武昌起義和雙十國慶」（美麗島雜誌社 1979c: 6, 7）。

七〇年代黨外人士對中國民族主義歷史敘事的內化，顯示國民黨統治與教育體制在教化戰後世代上的成功。中國人主體位置的思考，使他們面對省籍問題時，基於體制內改良主義的民主訴求，有如上述，強調台灣歷史、文化經驗的「中國性」，以「本省人當然也是中國人」的態度，要求本省人的公民身分被充分承認，應享有平等公民權與政治權。黨外人士雖不時有外省人不瞭解本省人、不太認同台灣的批評，³⁶但在當時台灣遭受外交挫敗、面臨生存危機時，黨外人士則以「大家都是中國人」的態度，對本、外省人能和諧相處、共渡難關，充滿懇切期待。³⁷譬如當時《八十年代》編輯群成員之一的林濁水(1947-)，在美麗島事件發生前三個月的一篇文章中，認為日據後期台灣人基於歷史文化意識，發起文化運動與政治自治運動，開展「以河洛文化為精神的日據時代台灣歷史與文學」。他強調當時台灣人參與孫中山的革命活動，兩岸人士合作早有淵源；而今天台灣又接納大陸來台人士，共同為保衛民族傳統文化，「建立起我民族數千年來最繁華富庶的社會」，因此「台灣人一千六百多年的歷史可以說是為保存其河洛文化的奮鬥」。對於戰後初期台灣行政長官公署認為「台灣人不是中華民族」的態度，以及二二八事件後「竟有少數人否認自己的河洛血統，並以此為政治上獨立運動的理論基礎」，林濁水都加以批判。對他而言，「省籍問題只是少數人在過去造成的」，而在七〇年代則「大家歧見已淡」。在進一步強調不能「歧視台灣先人的歷

36 譬如張俊宏(1977a: 229-230)、黃煌雄(1978a: 16-18)；參見林正杰(1978: 54)。

37 譬如張俊宏(1977a: 157-158, 245-246)、黃煌雄(1978a: 16)。

史」後，他呼籲「外省人和台灣人的成就都必須肯定」，雙方互相欣賞容納，而「台灣人的光榮歷史也是大家的光榮歷史」（林濁水 1979: 20-24）。

（三）黨外與日據時期抗日政治社會運動史及黃煌雄的研究

除了對世代身分的強烈自覺之外，從黨外人士另一方面鮮明的歷史感，亦即對台灣歷史的強烈關懷，尤其是對日據時期台灣人抗日政治社會運動史的興趣，我們更可以看出其特殊歷史感如何鑲嵌在更大的歷史敘事中而展現出來，也因此可以更瞭解「敘事認同」理論取向在理解認同與行動上所強調的故事與自我、敘事與認同（以及相關的利益、行動）、敘事性與主體性之間的辯證關係。黨外人士關懷台灣歷史，明顯由於渴望從過去來定位、理解現在與未來，而與他們當時的政治反對行動密不可分。正是這種企圖從過去來定位、理解現在與未來行動的強烈自覺，使當時黨外人士高度肯定康寧祥將日據時期台灣人政治社會運動史等帶入競選演講的創舉。譬如張俊宏曾指出這些抗日運動中的「台灣近代第一代先覺者」的歷史遺產，在光復後已中斷，使第二、三代無法繼承發揚，而「康先生最大的貢獻，即是在他的選舉運動中很莊嚴地給迷茫而缺乏自信的民眾一種嚴肅的歷史使命感」，「在群眾運動中傳播了一種具有震撼性的歷史聲音，使大眾發現了自我，發覺了自尊。也知道保鄉衛國的意義。這種莊嚴的聲音可說為台灣的選舉運動史劃下了一個新的里程。」³⁸張俊宏指出，康寧祥的這種創舉，使當時黨外運動異於以往郭國基等人所領導的反對運動，也甚至是促使戰後世代知識份子陸續投入政治反對運動的重要因素，因為「以前的智識份子總以為選舉就是流氓或草莽英雄的運動，不屑一顧，康寧祥扭轉了智識份子的觀念，使他們熱誠地開始投身於

38 〈紀念革命先賢蔣渭水先生逝世 46 週年座談會〉，《這一代雜誌》2: 62（1977 年 8 月）。

黨外群眾運動之中」(張俊宏 1977a: 192-193)。³⁹

日據時期是國民黨統治之前的一個最近的歷史階段，同時日本殖民統治也是台灣歷史上首次出現的近代國家統治模式。一般而言，戰後世代成員對前一個歷史階段的近代國家統治下的政治社會反抗運動，相當陌生。但是當時黨外人士在發展與政治反對運動相關的自我認同與正當化其行動時，殖民統治下的反抗運動成爲他們可以援引的切近的歷史經驗。⁴⁰ 日據時期台灣人的反抗經驗，在他們的自我認同建構與行動正當化過程中，呈現一定的作用。當時文化界戰後世代成員在重新發現日據時期台灣新文學時不斷自我批判對這一段過去的無知，並且慨嘆與上一代歷史經驗的斷絕(蕭阿勤 2002: 211-213)。而就像上述張俊宏的感受一樣，黨外人士則尤其慨嘆台灣人抗日政治社會運動史在戰後被遺忘。⁴¹

黨外人士對台灣歷史的強烈關懷，明顯集中在日據時期，特別是台灣人抗日政治社會運動史。這種情形，從美麗島事件之前的七〇年代最主要的四份黨外雜誌——《台灣政論》、《這一代雜誌》、《八十年代》、《美麗島》——清楚地反映出來。⁴² 除了最早的《台灣政論》中觸及台灣歷史的四篇文章都是關於抗日政治社會運動與人物之外，《這一代雜誌》、《八十年代》、與《美麗島》涉及非日據時期的各階段台灣史的文章各有三、五、三篇(分別見表二、四、六)，而單獨涉及台灣日據時期歷史的文章卻各有九、六、四篇(包括系列報導、座談會記錄、史料重刊等，分別見表三、五、七)。而這些涉及日據時期歷史的十八篇文章，除了少數三、四篇之外，都在探索

39 何文振也同意張俊宏如此對康寧祥的推崇(何文振 1978: 26)。

40 可參見《台灣政論》上甫出獄的黃華(1939-)以及翻譯台灣總督府的《警察沿革志》以介紹日據下台灣人工、農運動與台灣共產黨的正宏的想法(黃華 1975: 40; 正宏 1975: 48)。

41 譬如康寧祥的看法，見〈紀念革命先賢蔣渭水先生逝世46週年座談會〉，《這一代雜誌》2: 59(1977年8月); 黃煌雄(1977b: 11, 1978a: 19-21, 1978b: 20); 同時參見〈台灣近代「先覺者」的精神遺產座談會〉，《這一代雜誌》3: 18(1977年9月); (林正杰 1978)。

42 《這一代雜誌》的發行時間為1977年8月-1978年12月)、《八十年代》為1979年6月-1979年12月、《美麗島》為1979年8月-1979年11月。《這一代雜誌》於1979年1月遭停刊一年的處分。《八十年代》在美麗島事件發生後的1979年12月被停刊。

二〇年代台灣人對殖民統治的反抗。

表二 《這一代雜誌》（1977.7-1978.12）涉及台灣史的文章（日據時期除外）

序號	作者	篇名	出版年月	卷期	頁數	備註
1	何文振	台灣的歷史出路	1977.10.7	4	11-16	
2	載市政	記台灣光復的歷史鏡頭	1977.10.7	4	40-42	在「學術史話」專欄下
3	鍾孝上	讀台灣歷史有感	1978.11.15	15	45-46	

表三 《這一代雜誌》（1977.7-1978.12）涉及台灣日據時期歷史的文章

序號	作者	篇名	出版年月	卷期	頁數	備註
1		紀念革命先賢蔣渭水先生逝世46週年座談會	1977.8.1	2	54-63,46	在「學術史話」專欄下。 時間：1977.7.9 主辦者：這一代雜誌社 參與者：陳黎陽、黃煌雄、楊雲萍、王詩琅、蔣松輝、田朝明、陳益勝、康寧祥、姚嘉文、黃天福、張俊宏、
2		台灣近代「先覺者」的精神遺產座談會	1977.9.10	3	17-24	在「台灣史討論會」專欄下。 時間：1977.8 參與者：張俊宏、黃煌雄、洪炎秋、王詩琅、陳益勝、康寧祥、陳少廷、陳偉士、王聖士、胡月涵
3	蔣渭水	今年要做什麼？	1977.10.7	4	36-37	在「學術史話」專欄下。遺作重刊
4	黃煌雄	台灣近代「先覺者」的民族情操	1977.11.5	5	27-29	
5		台灣青年的使命	1977.12.15	6	52-53	轉載自《台灣民報》
6	黃煌雄	贊助台灣近代民族運動的日本人士的評價	1977.12.15	6	57-63	文末自註：本文曾發表於《自立晚報》，略有修改
7	林熹雄	黃師樵先生談「革命先賢」蔣渭水	1978.8.15	12	12-13	
8	黃煌雄	一項莊嚴的建議——紀念蔣渭水先生逝世四十七週年	1978.8.15	12	19-21	
9	黃煌雄	從蔣渭水精神談起——兼論台灣的昨天今天與明天	1978.12.15	16	44-45	1978.11.17 在「蔣渭水紀念歌發表會」上專題演講詞

表四 《八十年代》（1979.6-1979.12）涉及台灣史的文章（日據時期除外）

序號	作者	篇名	出版年月	卷期	頁數
1	林濁水	台灣是美麗島	1979.9	1.4	20-24
2	王詩琅	台灣拓殖的過程	1979.9	1.4	84-87
3	李欽賢	淺探三百年來 台灣美術的時代意義	1979.10	1.5	82-87
4	張旭成 著 胡倚風 譯	美麗之島	1979.12	2.1	7-10
5	楊祖珺	苦旦歌仔的滄桑	1979.12	2.1	91-94

表五 《八十年代》（1979.6-1979.12）涉及台灣日據時期歷史的文章

序號	作者	篇名	出版年月	卷期	頁數
1	李南衡	日據時代台灣的言論自由	1979.7	1.2	15-18
2	本刊編輯	蔣渭水活在我們心中	1979.9	1.4	79-80
3	黃煌雄	蔣渭水先生遺訓	1979.9	1.4	80-82
4	李筱峰	日本殖民下台灣的宗教自由——看五十年 前金權階級謀奪教產、教權的兩個個案	1979.9	1.4	83-84
5	本刊編輯	偉大的醫者——孫中山先生誕辰紀念特別 報導——昔日台灣社會中傑出的醫師 1. 吳海水醫師——台灣真青年、文化運動先覺者 2. 賴和醫師——悲天憫人懷抱蒼生的台灣文學之父 3. 韓石泉醫生——大丈夫不為良相當為良醫 4. 謝緯醫師——醫人肉體救人靈魂的台灣史懷哲 5. 吳新榮醫師——愛同胞、愛鄉土愛民族的詩人作家 6. 陳新彬醫師——威武不屈視死如歸的人格者	1979.11	1.6	77-83
6	卓國豪	不准紀念蔣渭水？	1979.9	1.4	73-74

表六 《美麗島》涉及台灣史的文章（日據時期除外）

序號	作者	篇名	出版年月	卷期	頁數
1	魏廷朝	新竹義民廟的祭典——客家人最大的拜拜	1979.9	1,2	77-78
2	劉峰松	一千八百萬人的台灣史	1979.10	1,3	69-76
3	謝苔心	革命家呢？還是流寇？(上)——「林爽文起義」的一些觀察	1979.11	1,4	99-104

註：三篇文章都在「美麗島」專欄下刊行。

表七 《美麗島》（1979.8-1979.11）涉及台灣日據時期歷史的文章

序號	作者	篇名	出版年月	卷期	頁數
1	黃煌雄	大家來紀念蔣渭水先生	1979.8	1,1	93
2	王詩琅	日人在台殖民地體制之奠定——爲紀念舅父廖金泰先生而作	1979.8	1,1	94-95
3	文抄公	台灣人有衛生，不識字！？——與林洋港先生談台灣教育史上最起碼的常識	1979.10	1,3	87-92
4	文抄公	請正確認識歷史的事實——向蘇南成市長進言	1979.11	1,4	91-98

註：四篇文章都在「美麗島」專欄下刊行。

從表三、五、七可以看出，在黨外人士對日據時期台灣人抗日政治社會運動史的探索中，黃煌雄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當時 30 歲出頭的黃煌雄，在 1978 年底首次成爲黨外立委候選人時，已被稱爲「研究台灣史的專家」（林正杰 1978: 53）。在此之前，黃煌雄在《台灣新生報》與《中國時報》海外版上，已連載發表了不少探討日據時期歷史的文章。他撰述的重點在二〇年代台灣人的抗日，並且結集出版了三本書：分別是《台灣的先知先覺者——蔣渭水先生》的蔣氏評傳（1976）、主要關於日據時期台灣人抗日政治社會運動的《台胞抗日史話》（1977b）、以及重刊蔣氏言論與文章的《被壓迫者的怒吼——蔣渭水先生選集》（1978c）。⁴³ 黃煌雄對上述歷史的探索、加入黨外的過程、企圖將二〇年代台灣人抗日政治社會運動與七〇年代黨外反國民黨運動聯繫起來的努力等，都具現了戰後世代知識份子在當時回歸鄉土潮流中特殊強烈的歷史感、以及如何依賴中國民族主義歷史敘事來理解台灣的過去、定位自己與台灣當前所處的時代與情境，並且建構某種關於自我、世代、與行動的意義。黃煌雄關於日據時期台灣人抗

43 《台灣的先知先覺者——蔣渭水先生》與《台胞抗日史話》原來都由作者自行出版。後者在封面上的書名為《被壓迫的台胞抗日史話》，不過版權頁上與後來黃煌雄本人提及時，都只做《台胞抗日史話》。1978 年這兩本書改由出版社發行，書名分別變成《革命家——蔣渭水》（1978d）與《非暴力的鬥爭》（1978e）。九〇年代初黃煌雄改寫二書，再度出版，書名則為《蔣渭水傳——台灣的先知先覺》（1992a）與《台灣抗日史話》（1992b）。參見下文的討論。

日政治社會運動史的探索，尤其是對蔣渭水的研究，因此有必要加以特別討論。

籍貫為宜蘭的黃煌雄，一直到 1978 年底在第一選區（台北縣、宜蘭縣、基隆市）代表黨外參選的不久之前，都尚未參與反對運動。1970 年獲台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學位後，黃煌雄曾任職企業界數年，並於大專院校兼課，後來遂辭職專心寫作。就在探索日據時期歷史並寫作、出版的過程中，他逐漸與黨外建立關係。後來黃煌雄曾如此回顧他在七〇年代後期探討日據時期歷史與投入黨外的經過：

在這段期間我寫了幾本書，給我心理上很大的安慰。在寫作過程，由於涉獵台灣近代史，剛好當時黨外人士正在談台灣史，興趣相合，所以彼此能夠溝通。我當時覺得他們的要求相當合理，因為當前執政黨的力量實在太大了，使得年輕人在熱情追求正義的心理下，支持黨外。由學校所教授的正常民主政治精神，加上這個因素，兩相結合，使許多青年出錢出力，自動來幫忙為自由民主奮鬥的黨外人士。……經由這些接觸，我一步一步的與黨外人士結成一體。⁴⁴

成為黨外一員的黃煌雄，就像當時許多黨外人士一樣，具有鮮明歷史感，既對戰後世代身分有強烈自覺，也相當關懷台灣歷史。黃煌雄個人的獨特之處，則在於除了康寧祥之外，他恐怕是當時最熟悉二〇年代台灣人反抗殖民統治歷史的黨外人士。然而與這方面並無著述的康寧祥比較，黃煌雄用心之深，用功之勤，在主要的黨外人士中則無人能及。更重要的是他基於先前對二〇年代台灣歷史的探索與熟

44 這是黃煌雄接受鄭南榕訪問的談話，見鄭南榕(1982a: 7)。1977 年底的五項地方公職人員選舉，黃煌雄曾在故鄉領表準備選縣長，但後來放棄。1982 年初，擔任過黃煌雄的助選員、而在宜蘭縣剛當選省議員的游錫堃，曾提到黃煌雄在 1978 年之前專注於寫文章、著書出版，「純粹是一個學者」。另一位黨外雜誌的作者也談到在此之前，黃煌雄「在宜蘭還不算主要的黨外人物」。以上見《亞洲人》2(3): 35 (1982 年 2 月)、《政治家》26: 13 (1982 年 4 月)。

悉，致力於將台灣人的抗日活動與戰後世代投身的反國民黨政治運動聯繫起來，為自己所屬的世代與黨外運動在台灣歷史上，也在中國歷史上，尋找適當的定位與意義。就此而言，黃煌雄可以說是從1975-1978年間投入黨外、充滿強烈歷史感、並且以基於中國（民族）認同的歷史敘事來理解自我、世代、行動的戰後世代知識份子的典型代表。

在七〇年代充滿重視台灣現實的呼聲中，黃煌雄早在加入黨外之前就已致力於探索台灣歷史。他對所謂「台灣近代民族運動」——亦即日據後期非武裝抗日運動——中的「先覺者」的探索，原本是受到回歸鄉土文化潮流所激發的。對他而言，《台灣的先知先覺者——蔣渭水先生》與《台胞抗日史話》即為亟待整理的鄉土歷史的一部份（黃煌雄 1977b: 4）。在參照日據時期台灣人抗日政治社會運動史而為戰後世代與黨外運動尋找歷史定位與意義時，黃煌雄明顯地將七〇年代投入黨外運動的戰後世代知識份子，比擬於半世紀前抗日的台灣知識青年。對他來說，日據後期台灣人非武裝抗日運動中的「……那些改革者，都是完全在大和民族的體制下長大的，一出生就是日本國民」，是「當時第一流的知識青年」（黃煌雄 1978a: 13, 15）。他認為，戰後世代應從這些祖父輩的「先覺者」的「精神遺產」中得到啟發與實踐的動力。⁴⁵

對於這種「先覺者」整體——尤其是1927年台灣文化協會分裂之前——的精神遺產，黃煌雄在《台胞抗日史話》一書的最後做了六點歸納。除了抗日先輩(一)受世界局勢、思潮與被殖民下不平等所激發的「自覺意識」、(二)致力於社會教育的「啟蒙精神」、(三)無私奉獻的純樸動機、以及(四)勇敢實踐而累積政治經驗之外，黃煌雄認為他們(五)反抗殖民統治，「打破隸屬觀念」而「激發台灣同胞的漢民族意

45 〈台灣近代「先覺者」的精神遺產座談會〉，《這一代雜誌》3: 18（1977年9月）。在這場座談會中康寧祥的類似看法，見該座談紀錄頁21。張俊宏則提到黃煌雄計畫以張俊宏所主編的《這一代雜誌》為園地，每個月舉辦座談會，探討「先覺者」的「精神遺產」，並特別邀請年輕一代來參加，以「承先啟後，希望歷史的火炬能幫助我們看清我們的前程」（頁17）。不過根據表三，這種座談會只舉行兩次。

識」，「並使台灣同胞以中華民族為榮」。黃煌雄進一步強調(六)「先覺者」與台灣同胞始終具有強烈的「民族情操」，認同中華民族，也尊崇孫中山而對其革命、統一中國的工作寄予厚望。因此黃煌雄總結認為「先覺者」與台灣同胞「絕對沒有對不起祖國」與中華民族，而這是了解台灣同胞的基礎（黃煌雄 1977b: 184-202）。這裡的闡述，就像前述康寧祥在 1975 年初質詢蔣經國時一樣，要求台灣歷史經驗的特殊性與「中國性」在公共領域被承認與重視。同時也基於當時台灣的生存危機，以激發民眾愛鄉愛國來正當化這種籲求。黃煌雄即宣稱，《台灣的先知先覺者——蔣渭水先生》的出版，將有助於澄清台灣近代非武裝抗日運動史，也「有助於中華民族的團結」（黃煌雄 1978d: 24）；而民眾如果瞭解這段歷史，將對中華民族產生「聯繫感與認同感」，尤其有助於國家現階段處境的穩定（黃煌雄 1980 [1979]: 175-176）。對他而言，二〇年代台灣人的抗日，是知識份子在台灣歷史上第一次集體的「關懷鄉土的愛國運動」（黃煌雄 1978a: 186, 1978f: 44）。

黃煌雄強調日據後期抗日的台灣人認同中國、中華民族，而他對於這段歷史的研究，大部分就集中在被日本殖民當局視為「極端民族自決主義者」的蔣渭水(1891-1931)身上。⁴⁶ 與黃煌雄為宜蘭同鄉的蔣氏，於 1921 年春開始參與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同年秋參與創立台灣文化協會，1927 年又參與成立台灣民眾黨。對黃煌雄而言，「蔣渭水先生的精神和命運，幾乎說明了台灣近代民族運動的全部涵義」（黃煌雄 1978b: 21）。在加入黨外之前而專心探索台灣史的過程中，黃煌雄感慨於蔣氏在戰後台灣近乎被遺忘，相關文獻稀少。因此他發憤撰作蔣氏傳記，於 1976 年秋出版《台灣的先知先覺者——蔣渭水先生》，並自認為「可能是目前台灣及世界上第一本以蔣渭水先生為主題而寫的書」（黃煌雄 1978d: 25）。這本書一方面探討蔣氏十年間的抗日活動（從 1921 年起，至 1931 年台灣民眾黨遭日本當局強制解

46 參見向山寬夫(1999 [1987]: 791)。

散，而隨後蔣氏病逝），另一方面也鋪陳時空脈絡，概要追述日據後期台灣人政治社會運動史。

在全書最後，黃煌雄蓋棺論定蔣渭水十年抗日活動的四點「歷史意義」。他首先簡短地談到(一)蔣氏有強烈的「鄉土情感」，「不僅是中華民族一位偉大的抗日英雄，也是台灣歷史上一位偉大的革命烈士」；並且認為(二)蔣氏「以民眾為基礎，以台灣為基地」的抗日是一種「本土運動」（黃煌雄 1978d: 218-228）。此外，就像上述綜結「先覺者」整體「精神遺產」時一樣，黃煌雄著力闡述的是蔣氏的(三)「民族主義的情操」與(四)「對孫中山先生的認同」，並認為蔣氏在這兩方面是「先覺者」之中表現最強烈的（黃煌雄 1978d: 23, 238, 244）。黃煌雄指出蔣氏因飽覽《孫中山全集》而形成其民族運動主張，使「『孫中山路線』變成『蔣渭水路線』」，進而「變成為台灣民眾黨的歸宿」（黃煌雄 1978d: 255-256）。他並且以 20 頁的篇幅羅列比較孫、蔣兩人言論的神似，顯示後者對前者的亦步亦趨，認為蔣氏是「台灣的孫中山」先生（黃煌雄 1978d: 261-282）。

在為蔣渭水立傳的最後，對照孫中山逝世後備受追念的哀榮，黃煌雄感嘆蔣氏在戰後自己的土地上卻被遺忘冷落（黃煌雄 1978d: 283）。投入黨外之前的黃煌雄發憤為蔣氏立傳，其初衷即在填補被遺忘的日據後期台灣人抗日政治社會運動史。對投入黨外之後的黃煌雄而言，戰後的政治反對運動則是認同中國／中華民族的日據下反抗活動的延續。他強調「三十多年來，在台灣出生長大而變成現在政府主要批評者的『黨外人士』」，都「深切體認：他們的政治工作，在精神上，代表台灣近代民族運動的延續」，「而台灣近代民族運動者儘管在異民族統治之下，卻對中華民族懷有深厚的民族情操」（黃煌雄 1978b: 20）。進一步而言，將日據後期台灣人抗日政治社會運動與七〇年代黨外運動都納入中國民族主義的歷史敘事，使其成為情節發展的一部份，並且以近代中國追求主權國家獨立自主的建國奮鬥為主題來理解這些過去，黃煌雄於是強調「以孫中山先生為主體的中國近代革命運動」與「以蔣渭水先生為代表的台灣近代民族運動」兩者所

代表的歷史潮流必須結合，期望承繼前者的國民黨與接續後者的黨外，都超越黨派與省籍之爭，共同「建立一個中華民族五千年未曾真正出現過的民主體制」（黃煌雄 1978a: 8-9, 22; 1979: 8）。

1978年底，黃煌雄在選前出版了《國民黨往何處去？》一書。在前一年底才當選為省議員的張俊宏為該書作序時，綜結黃煌雄幾年來沈浸在日據時期史料的工作，推崇他對台灣社會最大的貢獻，是「潛心於發掘和整理祖先的遺產」。張俊宏強調，這一方面使遭受日本殖民統治、國民黨高壓支配、與省籍之間不平等而自卑抑鬱的台灣同胞「重新找回了尊嚴和寄託」；另一方面則因為黃煌雄「不斷從歷史的角度來觀察現實政治，使現實政治問題的研究更具有其縱深」（張俊宏 1978c: 51, 52）。1978年底的選舉因台灣與美國斷交而延期，一年之後發生美麗島事件。在1980年底恢復的選舉中，黃煌雄當選為立委，並隨即被視為繼郭雨新與林義雄之後的「宜蘭黨外領袖」。⁴⁷黃煌雄先前為文著書，而在成為政治反對運動重要的一員後，仍然經常講論日據時期台灣人抗日政治社會運動史，因此有黨外人士認為他「是一個很有歷史感的人，所以他的一言一行好像都是在向歷史負責、向歷史交代」，視他為「黨外的學者型理論家」，而「以思想及理論聞名於黨外」。⁴⁸八〇年代初，在立委任內的黃煌雄曾如此定位他投身黨外最初的貢獻：

從我與黨外人士開始接觸，到我以黨外人士身分正式參加競選的過程中，我最主要的工作是在理論建構及台灣史研究。將黨外運動的努力與我們祖先的努力，聯結起來、連成一氣，講述其中的條理脈絡，使現在的運動，更具有歷史意

47 郭雨新在1975年底增額立委選舉中落選，兩年後離台赴美，八〇年代中逝世。因擔任郭雨新落選後選舉訴訟委任律師而投入黨外的林義雄，1977年底在宜蘭當選省議員，後因美麗島事件入獄。

48 也有黨外人士形容他是「讀書人」、沒有政治人物的「草莽性」，是「幹練的思想家」，卻還不是「練達的政治家」。以上見《政治家》26: 13, 14（1982年4月）與鄭南榕(1982b: 15)。

義。在這方面當時我是最用功的人。引進台灣近代史，使黨外運動的奮鬥目標更為具體，不至於顯得混亂、孤立與零碎。如此更能襯托出黨外運動的精神與祖先的精神相連貫。……在我初識黨外人士的時候，他們整個生命與精力，幾乎都用於選舉。在那個階段，幾乎選舉就等於政治。……在那時候，國民黨籠罩一切，氣氛非常不好。參與選舉過程上所遭受的壓力，迫使黨外人士不得不把選舉視同生命，不然就無法立足。「選舉視同政治」，這種誤解、這種背景，我曾經用心加以思考，並且以非常沈重的心情，把它指明出來。……在觀念上的提醒、台灣歷史研究的引進，把黨外奮鬥目標納入整個歷史潮流及世界角度來思考，這些思想工作，是我加入黨外陣容之後，成為候選人之前，我自己覺得比較安慰、比較有益的事情。⁴⁹

不管是張俊宏對黃煌雄的讚譽，或是黃煌雄對自己的定位，涉及的核心都是一個歷史敘事的建立與維持，而所呈現的則是 1975-1978 年間投入黨外的戰後世代知識份子的典型。這個典型代表的特色是：對自己所屬世代身分的鮮明自覺、充滿強烈的歷史感、基於對台灣鄉土的深刻認同而熱切關懷台灣歷史，而他們在成長期間所內化的中國（民族）認同，則使他們以一個涵蓋中國／台灣歷史的敘事將過去與現在、未來聯繫起來，並憑藉這個歷史敘事以理解自我、世代、與行動的意義與價值。

（四）七〇年代黨外歷史敘事的尾聲：呂秀蓮與「中華民國獨立」

不過七〇年代黨外以中國民族主義敘事來理解其反對運動，在實際的行動目標上則以保衛台灣為目的。從退出聯合國到中美斷交，台

49 黃煌雄接受鄭南榕訪問的談話，見鄭南榕（1982a: 7-8）。參見黃煌雄（1983: 159）。

灣社會面臨的一大政治問題是在外交孤立與中共漸增的威脅下，如何能以中華民國之名，在國際社會中繼續生存下去。而這也是激發當時黨外運動的一大因素，是戰後世代黨外人士的認同、敘事、與行動所圍繞的主要問題意識。一般而言，黨外人士即使懷抱中國（民族）認同，但這種認同在政治上落實的國家選擇，至多是沒有排除一個可能涵蓋台灣與大陸的「未來中國」的出現而已。黨外人士念茲在茲的是如何確保「台灣中國」，以對抗「大陸中國」（譬如張景涵 1975: 9-10）。中美斷交後到美麗島事件前，呂秀蓮公開提出的「中華民國獨立」主張，可以說是黨外這種理念的極致表現。1978年底成為黨外國代候選人的呂秀蓮，在競選活動期間出版了《台灣的過去與未來》一書，並於中美斷交、選舉停辦後的隔年再度修訂出版。該書近 250 頁，分為四部分，分別討論「台灣的過去」（包括（一）「關於『台灣』的基本認識」，（二）「台灣歷史紀元」，（三）「台灣歷史的特色」）、「台灣問題的演變」、「台灣的現在」、與「台灣的未來」。就像黃煌雄的著作一樣，這本書具現了七〇年代黨外將現在的自我與社會置於過去與未來之間、憑藉一個特殊的歷史敘事來發展認同與行動的現象。但是與黃煌雄的著作相比，這本書或許是七〇年代黨外特殊而強烈的歷史感最有系統的呈現。

在《台灣的過去與未來》一書中，呂秀蓮明白地指出有關台灣歷史的著作絕大部分都基於中國正史的角度，「不曾真正以台灣本土作主體」。因此她決定超越中國本位主義，「只單純地站在台灣本土以及居住在台灣本土的人民的立場」來探討台灣的過去（呂秀蓮 1979: 58-59）。對她而言，台灣的過去是一部充滿移民與殖民過程的開發史：移民者在台灣安身立命，能「與台灣認同，老死台灣」；反之，殖民者卻剝削壓榨人民，「既不認同台灣，臨危則三十六計逃為上策」。她指出西班牙、荷蘭、明鄭、清廷、與日本的「外來政權」，以「少數人統治多數人」，都是與人民之間彼此沒有認同、利害相反的殖民者（呂秀蓮 1979: 59, 105-106）。因此她疾呼：「台灣歷史的基本特色是，它是一段三百年來沒有主權，身不由己，任人擺佈的悲

慘歷史！」（原文的強調）（呂秀蓮 1979: 108）。呂秀蓮「回顧過去」、「瞻望未來」，認為台灣在國際上孤立、前途堪慮之際，有必要「檢視台灣歷史所具有的時代意義」，認識到島上人民必須「當家做主」，擺脫如同孤兒、養女的歷史悲運，爭取對土地與政府的主權，自立自救（呂秀蓮 1979: 61, 105, 107, 161）。至於誰是台灣人民，她強調：「台灣歷史指出，台灣島上的住民無所謂本省外省之分，只有移民先後的不同而已，凡是認同台灣，願意與台灣共存亡而同甘共苦的都是台灣人」（原文的強調）（呂秀蓮 1979: 161）。

不過呂秀蓮進一步指出，「愛台灣即是愛中國」，「講解台灣的歷史，當然也就是講解中國的歷史」，而「我愛台灣」並不存有偏狹的地域觀念，「無損於台灣人是中華民族的事實」（呂秀蓮 1979: 166-167）。在這種愛台灣就是愛中國、台灣人當然屬於中華民族、台灣歷史也就是中國歷史的認同與敘事中，呂秀蓮政治上的現實主張是未來的「一個中國——但不是現在」。她呼籲國民黨體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已被國際社會普遍承認的事實，放棄中國只有一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以及中華民國是中國唯一合法政府的堅持，務實地承認中國是分裂的國家、存在對立的政權（呂秀蓮 1979: 221-223）。於是呂秀蓮明白提出「中華民國獨立」的主張，認為：

如果我們既不採取武力反攻，又無法以既有的基本國策——中國只有一個，台灣是中國的領土，中華民國是中國唯一的合法政府——衝破外交困境，重入國際社會，則破釜沈舟地宣佈台灣脫離中國大陸，中華民國獨立自主，將為我們必須面臨的抉擇。此一抉擇可以直接宣布台灣獨立的表面化方式公然行之，也可以兩個中國，一個中國兩個政府的實質方式替代……。（呂秀蓮 1979: 241）⁵⁰

50 呂秀蓮曾於七〇年代初加入國民黨，但於選舉停辦後被開除黨籍。當時國民黨的理由之一是呂秀蓮在選舉期間「鼓動台獨思想」。見《八十年代》1(1): 68。

在美麗島事件不過三個月之前修訂出版的《台灣的過去與未來》一書，做為當時黨外歷史感最有系統的呈現，可以說是七〇年代黨外歷史敘事重要的尾聲。然而從事後回顧的觀點來看，它同時也是八〇年代黨外「台灣意識」的先聲。呂秀蓮的歷史觀與「中華民國獨立」主張，可以說預示了美麗島事件後、八〇年代上半葉黨外「台灣意識」宣揚中鮮明的台灣民族主義的歷史敘事與認同，以及獨立建國的行動主張。然而如果沒有美麗島事件的發生，黨外政治理念與行動是否會在八〇年代後快速地激進化，恐怕不無疑問。而在此過程中企圖取代「中國史觀」的台灣民族主義歷史敘事——亦即八〇年代之後反國民黨的本省籍政治與文化界人士所謂的「台灣史觀」——是否會快速發展，恐怕也很難說。從八〇年代後台灣史觀發展的角度來看，七〇年代的戰後世代所發展的鄉土文學、挖掘日據時期台灣文學、以及黨外的台灣歷史探索的貢獻，就在於提供、準備了台灣民族主義歷史敘事情節所需的素材，亦即那些在戰後社會公共領域中被忽略、排除、壓抑的、關於台灣的種種過去。然而七〇與八〇年代，兩者畢竟不同。七〇年代在回歸鄉土、民主革新、省籍平等要求中，戰後世代的歷史敘事主體，是做為中國人、中華民族的台灣人。那些被重新挖掘、要求在公共領域被承認、重視的種種過去，都從這個主體位置取得意義，並且藉著相關行動的問題意識所引領的情節賦予，成為其歷史敘事情節的組成部分，彼此共同構成一個具有內在意義的整體。到了八〇年代，那些已歷經十年光陰所挖掘關於台灣的種種過去，成為台灣民族主義歷史敘事情節現成的材料。一旦揚棄了中國、中國人認同，而以台灣人、台灣民族做為新的敘事主體，根據新的行動的問題意識（獨立建國）賦予那些素材新的意義，那麼一個完整的台灣史觀於焉浮現。在《台灣的過去與未來》修訂出版的同一個月，林濁水的〈台灣是美麗島〉一文出現在《八十年代》。該刊的編者在文章前加了如下的按語：

台灣在過去中國歷史上，幾乎是完全沒有地位的。台灣在地

理上多山，多颱風，多地震；在政治上則是難民和殖民交織的悲愴史。島上居民從來沒有自己「當家做主」的機會，再加上當權者隨著政治需要來扭曲台灣歷史，而使台灣島上居民，很少覺醒到自己的地位和價值。因此民性普遍感染孤兒或棄兒的淒涼意識。

但是也許是命運的捉弄，當初從中原輾轉流亡到台灣的居民，反而保存了相當程度的中原河洛文化；台灣被清廷割讓給日本，淪為外族的殖民地，反而使島民免受中國內戰的破壞，因而奠定今天經濟發展的基礎；國民黨政府從大陸撤退來台，本來是以一種逃難避難的心情，完全沒有久居長住的打算，想不到今天卻要以建設台灣模式，當作未來回到大陸的藍圖，因此未來的台灣不僅在軍事、政治，甚至文化上，均擔負史無前例的責任。

台灣，台灣，我們美麗的寶島，我們要彈除歷史塵灰，拋掉淒涼回憶，緊緊把握機會，創造自己未來的命運，為中華民族塑造一個新地位。（林濁水 1979：20）

這段按語中的歷史敘事，與《台灣的過去與未來》一書中的極其相似。它們一旦放棄中國人、中華民族主體的認同觀點，譬如摘掉這段按語中最後「為中華民族塑造一個新地位」那幾個字，就幾乎成為典型的台灣民族主義歷史敘事。從七〇到八〇年代，就像所有的歷史過程一樣，既有其連續，也有其變化。從事後回顧的觀點來看，從七〇年代追求民主革新與省籍平等的族群政治／文化轉變到八〇年代之後追求獨立建國的民族主義政治／文化，以及其間涉及的敘事、認同、與行動的差異，並非跨越一線之隔那麼容易而自然地連續。激化黨外人士——以及許許多多後來成為台灣民族主義者的人士——全然突破那族群政治／文化與民族主義政治／文化之界線的，是從七〇年代到八〇年代之交，國民黨政府面對黨外挑戰時所主導的壓制、衝突、暴力、流血、構陷、監禁、與謀殺，以及這些所帶來的眾多犧牲。⁵¹

四、結論

如前所述，本文的目的一方面在分析七〇年代黨外對台灣人抗日歷史的建構，另一方面則在討論工具論角度對政治行動中認同與歷史敘事的理解，究竟是否恰當。本文對黨外的歷史建構的探討，顯示其做為中國人、中華民族的台灣人認同、以中國民族主義為本的台灣歷史敘事、與其改良主義的政治社會行動之間密不可分的關係。這種認同、敘事、與行動——尤其是與公共領域的政治實踐——的必然關連，敘事認同理論的先驅奠基者之一的 Hannah Arendt，在半個世紀前已經明白指出(Arendt 1998 [1958]: 175-188, 199-207; 蔡英文 2002: 67-69, 123-137)。

對政治實踐的行動者而言，歷史敘事不僅有表意的作用，亦即行動者藉之理解自我、掌握行動意義、建構集體認同、激發實踐的動力等，同時它也可能有相對上比較屬於工具性的作用，亦即行動者藉之轉化群眾意識、鼓吹集體行動、甚至借古諷今、迂迴表達政治目標、轉移政治對手注意力、預留說詞以自我保護等。在一個並非自由開放的社會，對抗政權的政治異議份子的歷史敘事具有相當的工具性意涵，自然可以想像。因此，如果認為黨外的歷史建構強調台灣鄉土歷史與認同，卻仍然必須以國民黨政權可以接受的中國民族主義敘事模式來呈現，是戒嚴統治白色恐怖下不得以的自保說詞與行動策略，似乎也相當可以理解。換句話說，我們不可以天真地以為威權統治下公共領域的政治修辭與雄辯代表政治異議份子所有的認知與情感。不過即使如此，本文藉著具體史料分析所欲顯示的重點是：理解七〇年代黨外的歷史敘事，不能不考慮其做為戰後世代而深受國民黨體制下大

51 關於美麗島事件後的八〇年代上半葉，黨外激進人士的崛起、宣揚台灣意識的黨外雜誌大量出現、以及國民黨各種方式的持續打壓等因素交互作用，使當時反對運動激進化，尤其是從追求「民主化」轉向台灣民族主義的過程，見王甫昌(1996: 165-173)。關於本省籍文化界人士在當時受美麗島事件與上述過程激發而轉變為台灣民族主義者的經過，見蕭阿勤(1999)、Hsiao (2000)。

中國思想教育影響的事實。即使黨外在公共領域的歷史敘事有其策略性、工具性的考慮，大量的史料所呈現他們對世代身分與台灣歷史的自覺關懷，整體而言，並未脫離中國人、中華民族的台灣人認同，而實相應於七〇年代普遍的政治社會改良主義。這個時期是戰後世代發展集體性質的政治異議與行動的初始階段。從台灣反對運動發展的歷史來看，這個階段的戰後世代仍然反映中國民族主義及其歷史敘事的深刻影響，毋寧是很自然的事。

再者，如本文一開始所指出的，八〇年代之後眾多的黨外人士，以及本省籍文化界人士逐漸成為台灣民族主義者。在台灣民族主義發展過程中，我們看到從中國（民族）的到台灣（民族）的歷史敘事與認同的明顯變化。然而如果認為這種較晚出的敘事與認同才反映其「真實的」認知與情感，而七〇年代黨外以中國民族主義為本的台灣歷史建構，純然只是工具性的自保說詞與行動策略，是認同議題的工具論的絕佳例證，那麼這樣的看法無異於否認政治與社會變遷——在這裡特別指美麗島事件與八〇年代上半葉黨外與國民黨的衝突對抗——影響行動者、以及行動者與情境互動而自我轉化的可能。八〇年代後黨外與本省籍文化界人士的轉化，反映的仍然是情境變動中行動者反身性思考與實踐的結果，亦即反映認同、敘事、與行動之間辯證的、過程的關係，而非行動者長久以來刻意遮掩的真實自我的最終展現。如前文提到的，反本質論的工具論弔詭地又假設了一種本質的理性的自我。從敘事認同的觀點來看，這種隱含的二分法——亦即本質的、真實的自我（以及伴隨它的利益、行動方針）與敘事的、工具性的自我（以及伴隨它的利益、行動方針）的區別——是不恰當的。日常可見的政治批判中，以「揭露」（政治上的、不道德的、自私的）利益的方式攻擊異己的民族主義歷史敘事與認同，是相當方便而流行的做法。O'Leary 就指出，工具論有一種「想辦法暴露民族主義背後的既得利益之刺人的、揭穿假面具的趣味」，因此成為「反民族主義者偏愛的理論」（O'Leary 2001: 148）。同時也像張茂桂與吳忻怡在台灣八〇年代以來政治／文化本土化逐漸取得社會優勢、而外省人有

被邊緣化的危機感之脈絡中所指出的，過於從工具、利益取向理解認同問題的政治評論，往往容易流於對他者的誤會或鄙視（張茂桂、吳忻怡 2001: 175-176）。⁵²

日常的政治批判中數典忘祖、喪心病狂、別有居心、政治野心份子之類的指控，明顯地涉及族群與民族主義的認同政治中所謂「史觀」的對立，亦即歷史敘事的衝突。從敘事者的主體位置出發，敘事以情節將人們直接的與間接的經驗，以及過去、現在、與未來，整合聯繫成一個具有內在意義關連的整體，提供人們建立認同、思考利益、與決定行動的重要參考架構。這種參考架構非常重要，而在相當程度上影響人們對真、善、美的判斷，具有重要的道德、倫理作用（MacIntyre 1984: 204-225; Taylor 1989: 47-48）。許多敘事理論者以不同的方式來形容敘事的這種重要性，譬如稱敘事為「典範」（paradigms）、「對現實的包裹觀點」（capsule views of reality）、「詮釋機制」（interpretive devices）、「世界觀」（world views）（Hinchman and Hinchman 1997: xvi）。族群與民族主義認同政治經常涉及的對立「歷史詮釋」之所以難以找到令當事的各方可以滿意的替代詮釋，通常不在於敘事情節所涵蓋的歷史經驗或事件的差異，而在於從不同敘事者的主體位置出發，賦予歷史經驗或事件在不同的整體情節中不同的位置與意義所致。情節既構成一個整體，經驗或事件的意義來自這個整體結構以及它在整體中的位置（而不是相反，亦即不是個別的經驗或事件的累積才歸納地發展出整體的意義架構），⁵³ 史觀或歷史詮釋的衝突就呈現為這種參考架構整體——或者說典範與世界觀——的互相衝突。這種衝突因此具有強烈而全面的道德對抗意涵，當事者往往有一種執著的情緒，不容易相互承認與尊重（張茂桂、吳忻怡 2001:

52 從敘事認同的觀點來看，外省人具有政治／文化上被疏離、被邊緣化的危機感，牽涉到的一個重要問題，正是與其認同不可二分的歷史敘事在公共領域被排斥的過程。關於這一點，可以參考孫鴻業(2002)。

53 人類學家Edward M. Bruner曾分析 20 世紀美國人類學界關於印地安人的民族誌，並指出這些民族誌的敘事結構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後產生明顯變化。他所歸結的論點之一，與筆者在此的看法相似。參見 Bruner (1997 [1986]: 267)。

148-149, 152)。事實上，不僅不少的社會科學理論不重視人的道德與價值理念，不當地假設人的行動——特別是政治行動——的主要動機是理性的自利考慮（吳乃德 2000: 85），同時類似的假設也左右許多日常的政治評論，尤其是那些針對他者的認同與行動的批判。人們對於某種道德與價值理念的執著，在相當大的範圍與程度上，正來自於將自己置身於特定歷史敘事中而來的連帶。

族群與民族主義的認同政治中的衝突、屈辱、與仇恨，幾乎無可避免地涉及對於別人的故事的不屑一顧，對別人涉及自我認同的歷史敘事漠然以對、甚至嗤之以鼻、壓制排斥。要減少這種冷漠、譏諷、與敵意，以及伴隨而來的衝突、屈辱、與仇恨，也許有不少方法，但其中之一至少是在適當的時候擱置工具論，認真而接納地對待他人的故事。換句話說，從敘事認同的觀點而言，不管是在認同的理論分析上，或者在日常認同政治的批判實踐上，切要的是如何對待人們認同的「敘事的真實性」(narrative authenticity of identity)，而不是其「本質上的真實性」(essential authenticity of identity)。也只有以這樣的理論觀點，才能恰當地理解七〇年代黨外的歷史建構，以及八〇年代以來台灣史觀、台灣民族主義的發展。

誌謝：本文為國科會九十年年度專題研究計畫部分研究成果（計畫編號：NSC 90-2412-H-001-012）。研究助理孫鴻業與蔡幸娟先後協助文獻資料的蒐集整理，瑞士蘇黎世大學(University of Zürich)東亞研究所漢學部 Thomas Frohlich（費瑞實）與中研院社會所王甫昌提供資料，監察委員黃煌雄、國家安全會議秘書長康寧祥（當時任監察委員）、立法委員張俊宏接受訪問，中研院台史所周婉窈協助訪問康寧祥，都在此一併致謝。本文初稿曾於中研院民族所（2002年5月13日）報告，在此也感謝黃宣衛及與會諸君的批評，以及中研院社會所柯志明、王甫昌的修改建議。

參考文獻

- 八十年代出版社編輯部(1979)「自由中國」選集總序。見該編輯部編，「自由中國」選集，各集頁 3-12。台北：八十年代出版社編輯部。
- 《八十年代》編輯部(1979)許信良專訪。八十年代 1(3): 6-16。
- 凡夫(葉榮鐘)(1975a)台灣民族詩人林幼春。台灣政論 3: 66-69。
- (1975b)革命家蔣渭水。台灣政論 5: 76-79。
- 王玉靜主編(2001)蔣渭水逝世七十週年紀念專刊。台北：台灣研究基金會。
- 王京瓊(2002)簡析「文化台獨」。http://202.130.245.40/chinese/zhuanti/179287.htm。
- 王甫昌(1996)反對運動的共識動員：一九七九～一九八九年兩波挑戰高峰的比較。台灣政治學刊 1: 129-210。
- 正宏(譯)(1975)日本人眼中的台灣抗日運動。台灣政論 4: 48-52。
- 向山寬夫(1999[1987])日本統治下的台灣民族運動史。楊鴻儒等譯。台北：福祿壽。
- 宋國誠(1978)理性的批評，誠懇的呼籲。見宋國誠、黃宗文，新生代的吶喊，頁 1-4。台北：作者自印。
- 宋國誠、黃宗文(1978)新生代的吶喊。台北：作者自印。
- 何文振(1973)追隨理想的新青年。大學雜誌 62: 39。
- (1975)台灣大地主。台灣政論 3: 16-19。
- (1978)給國民黨的諍言。台北：春風。
- 李筱峰(1987)台灣民主運動 40 年。台北：自立晚報。
- 李新乙(2002)「文化台獨」擋不住中國統一進程。http://big5.huaxia.com/HaiXiaJiaJiao/YanLun/GBK/89679.html。
- 呂秀蓮(1979)台灣的過去與未來。台北：拓荒者。
- 林正杰(1978)我的政治見解：黃煌雄訪問記。這一代雜誌 15: 53-57。
- 林勁(2001)淺析「文化台獨」的實質及影響：「文化台獨」的內涵及本質。http://www.future-china.org/fcn-tw/200108/2001080106.htm。
- 林濁水(1979)台灣是美麗島。八十年代 1(4): 20-24。
- 金文吉(張金策)(1975)破除幻想，面對問題。台灣政論 3: 12-14。
- 美麗島雜誌社(1979a)民主萬歲。美麗島 1(1): 4-9。
- (1979b)民主、法治與合法性危機。美麗島 1(3): 4-6。
- (1979c)沒有改革就沒有前途——雙十國慶感言。美麗島 1(3): 6-7。
- 吳乃德(2000)人的精神理念在歷史變革中的作用——美麗島事件和台灣民主化。

台灣政治學刊 4: 57-103。

吳嘉邦(1978)有感兩次擔任競選總幹事。這一代雜誌 13: 11-13。

姚嘉文(1978)每個人都有權利說話。見何文振，給國民黨的諍言，頁 13-15。台北：春風。

——(1979a)「叛國」論——國不可叛，民不可辱。美麗島 1(1): 61-65。

——(1979b)愛國論：有生民之國，自有愛國之民。美麗島 1(3): 93-97。

孫鴻業(2002)污名、自我、與歷史：台灣外省人第二代的身分與認同。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康寧祥(1975)問政三年。台北：台灣政論雜誌社。

莊俊清(1977)一個黨員和民選議員的真心話——許信良「風雨之聲」書介。夏潮 2(6): 59-62。

張茂桂、吳忻怡(2001)關於民族主義論述中的認同與情緒——尊重與承認的問題。

見林佳龍、鄭永年編，民族主義與兩岸關係：哈佛大學東西方學者的對話，頁 147-180。台北：新自然主義。

張俊宏(1977a)我的沈思與奮鬥——兩千個煎熬的日子。台北：作者自印。

——(1977b)我們的話。這一代雜誌 1: 3-5。

——(1978a)新生代的挑戰。這一代雜誌 9: 17-18。

——(1978b)潮流的訊息。見陳婉真，勇者不懼：我為什麼要競選立法委員？頁 3-6。台北：長橋。

——(1978c)國民黨往何處去序文：支配者亦是競爭者？這一代雜誌 14: 51-52。

張景涵（張俊宏）(1975)我們的方向與現代化。台灣政論 4: 9-15。

張詩劍(2002)中華文化之根不可動搖——駁「文化台獨」。http://202.130.245.40/chinese/TCC/haixia/112070.htm。

軒轅平(1979)折筆傳奇——陳婉真的心路歷程（下）：三十年來台灣政治、社會教育的一個個案。美麗島 1(4): 17-29。

陳允中(1978)不要長敵人威風而滅自己的志氣。這一代雜誌 8: 59。

陳映真(2001)論「文學台獨」。http://www.china-tide.org.tw/leftcurrent/currentpaper/taidu.htm。

陳菊(1978)台灣查某囡仔——陳婉真。見陳婉真，勇者不懼：我為什麼要競選立法委員？頁 11-12。台北：長橋。

——(1988)締造我命運的人——懷念郭雨新先生。見郭惠娜、林衡哲編，郭雨新紀念文集：台灣民主傳教士，頁 33-36。台北：前衛。

陳婉真(1978)勇者不懼：我為什麼要競選立法委員？台北：長橋。

廖翊(2002)與日俱增的不安——訪台灣大學教授黃光國。http://www.gptaiwan.org.

tw/~cylin/China/2002/2002_8_6_3.htm。

- 黃信介(1975)黃序。見康寧祥，問政三年，頁 6。台北：台灣政論雜誌社。
- (1979)共同來推動新生代政治運動！美麗島 1(1)：封面底-1。
- 黃華(1975)減刑人的信心。台灣政論 3: 39-41。
- 黃煌雄(1976)台灣的先知先覺者——蔣渭水先生。台北：作者自印。
- (1977a)今年五項公職選舉的歷史意義。這一代雜誌 6: 6-7。
- (1977b)台胞抗日史話。台北：作者自印。
- (1978a)國民黨往何處去？台北：長橋。
- (1978b)一項莊嚴的建議——紀念蔣渭水先生逝世四十七週年。這一代雜誌 12: 19-21。
- (編)(1978c)被壓迫者的怒吼——蔣渭水先生選集。台北：長橋。
- (1978d)革命家——蔣渭水。台北：長橋。
- (1978e)非暴力的鬥爭。台北：長橋。
- (1978f)從蔣渭水精神談起：兼論台灣的昨天今天與明天——民國六十七年十一月十七日在「蔣渭水紀念歌發表會」上專題演講詞。這一代雜誌 16: 44-45。
- (1979)競爭者之路——國民黨與黨外的健全化。八十年代 1(1): 6-8。
- (1980[1977])今年五項公職選舉的歷史意義。見黃煌雄，到民主之路，頁 7-13。台北：作者自印。
- (1980[1979])一段塵封的史跡——訪黃煌雄談台灣史。見黃煌雄，到民主之路，頁 175-187。台北：作者自印。
- (1983)台灣的轉捩點：訪問演講篇。台北：作者自印。
- (1992a)蔣渭水傳——台灣的先知先覺。台北：前衛。
- (1992b)台灣抗日史話。台北：前衛。
- (2001)同胞須團結，團結真有力。見王玉靜主編，蔣渭水逝世七十週年紀念專刊，頁 4-5。台北：台灣研究基金會。
- 葉石濤(1975)楊逵的「鵝媽媽出嫁」。大學雜誌 87: 33-35。
- 葉榮鐘(1975)台灣民族運動的鋪路人蔡惠如。台灣政論 1: 57-58。
- 趙遐秋(2001)要警惕「文學台獨」的惡性發展。<http://big5.huaxia.com/HaiXiaJuJiao/JiaoDian/ZhongHuaWenHuaYuLiangAnGuanXiLunTan/YanLunWenZhai/GBK/32775.html>。
- 蔡英文(2002)政治實踐與公共空間——漢娜·鄂蘭的政治思想。台北：聯經。
- 鄭南榕(1982a)「真有力」的政治思想家——黃煌雄：訪問黃煌雄。政治家 26: 6-12。
- (1982b)黃煌雄有先見之明。政治家 26: 15。

- 鄭鴻生(2001)青春之歌：追憶 1970 年代台灣左翼青年的一段如火年華。台北：聯經。
- 蕭阿勤(1999)1980 年代以來台灣文化民族主義的發展：以「台灣（民族）文學」為主的分析。台灣社會學研究 3: 1-51。
- (2000)民族主義與台灣一九七〇年代的「鄉土文學」：一個文化（集體）記憶變遷的探討。台灣史研究 6(2): 77-138。
- (2002) 抗日集體記憶的民族化：台灣一九七〇年代的戰後世代與日據時期台灣新文學。台灣史研究 9(1): 181-239。
- Abbott, Andrew (1992) From Causes to Events: Notes on Narrative Positivism. *Sociological Methods & Research* 20(4): 428-455.
- Arendt, Hannah (1998 [1958]) *The Human Condi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Barker, Chris (2000) *Cultural Studies: Theory and Practice*. London: Sage.
- Barthes, Roland. (1977[1966]). Introduction to the Structural Analysis of Narratives, translated by Stephen Heath. Pp.79-124 in *Image, Music, Text*, edited by Stephen Heath. New York: Hill and Wang.
- Bennett, Andrew and Nicholas Royle (1999) *An Introduction to Literature, Criticism, and Theory* (second edition). London: Prentice Hall Europe.
- Brown, David (2000) *Contemporary Nationalism: Civic, Ethnocultural and Multicultural Politics*. London: Routledge.
- Bruner, Edward M. (1997 [1986]) Ethnography as Narrative. Pp. 264-280 in *Memory, Identity, Community: The Idea of Narrative in the Human Sciences*, edited by Lewis P. Hinchman and Sandra K. Hinchman.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 Calhoun, Craig (1993a) 'New Social Movements' of the Early Nineteenth Century. *Social Science History* 17(3): 385-427.
- (1993b) Nationalism and Ethnicity.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19: 211-239.
- Chodorow, Nancy (1978) *The Reproduction of Mothering*.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Cornell, Stephen and Douglas Hartmann (1998) *Ethnicity and Race: Making Identities in a Changing World*. Thousand Oaks, CA.: Pine Forge Press.
- De Lauretis, Teresa (1984) *Alice Doesn't : Feminism, Semiotics, Cinema*. Bloomington, ID: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 Geertz, Clifford (1963) *The Intergrative Revolution: Primordial Sentiments and Civil*

- Politics in the New States. Pp. 105-157 in *Old Societies and New States: the Quest for Modernity in Asia and Africa*, edited by Clifford Geertz. London: Free Press of Glencoe.
- Giddens, Anthony (1991) *Modernity and Self-Identity: Self and Society in the Late Modern Age*.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Gilligan, Carol (1982) *In a Different Voice: Psychological Theory and Women's Development*.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Himmelfarb, Gertrude (1984) Denigrating the Rule of Reason: The 'New History' Goes Bottom-up. *Harper's Magazine* April: 84-90.
- Hinchman, Lewis P. and Sandra K. Hinchman (1997) Introduction. Pp. xiii-xxxii in *Memory, Identity, Community: The Idea of Narrative in the Human Sciences*, edited by Lewis P. Hinchman and Sandra K. Hinchman.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 Hsiau, A-chin (蕭阿勤) (2000) *Contemporary Taiwanese Cultural Nationalism*. London: Routledge.
- Isaacs, Harold R. (1975) *Idols of the Tribe: Group Identity and Political Chang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Kellner, Hans (1989) *Language and 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 Getting the Story Crooked*. Madison, WI: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 MacIntyre, Alasdair (1984) *After Virtue: A Study in Moral Theory*. Notre Dame, IN: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 Maines, David R (1993) Narrative's Moment and Sociology's Phenomena: Toward a Narrative Sociology. *The Sociological Quarterly* 34 (1): 17-38.
- 2001. *The Faultline of Consciousness: A View of Interactionism in Sociology*. New York: Aldine de Gruyter.
- O'Leary, Brendan (2001) Instrumentalist Theories of Nationalism. Pp. 148-153 in *Encyclopaedia of Nationalism*, edited by Athena S. Leoussi. New Brunswick: Transaction Publishers.
- Polkinghorne, Donald E. (1988) *Narrative Knowing and the Human Sciences*. Albany, 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 Reynolds, Vernon, Vincent Falger, and Ian Vine, eds. (1987) *The Sociobiology of Ethnocentrism*. London: Croom Helm.
- Richardson, Laurel (1990) Narrative and Sociology.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thnography* 19(1): 116-135.

- Ricoeur, Paul (1980, 1981) Narrative Time. Pp. 165-186 in *On Narrative*, edited by W. J. T. Mitchell.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1981) The Narrative Function. Pp. 274-296 in *Hermeneutics and the Human Sciences: Essays on Language, Action and Interpretation*,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John B. Thomps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984) *Time and Narrative*, vol. 1. Translated by Kathleen McLaughlin and David Pellauer.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Ringmar, Eric (1996) *Identity, Interest and Action: A Cultural Explanation of Sweden's Intervention in the Thirty Years Wa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cott, Joan Wallach. (1988) *Gender and the Politics of Histor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Shaw, R. Paul. and Yuwa Wong (1989) *Genetic Seeds of Warfare: Evolution, Nationalism and Patriotism*. Boston: Unwin Hyman.
- Shils, Edward (1957) Primordial, Personal, Sacred and Civil Ties: Some Particular Observations on the Relationships of Sociological Research and Theory.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8: 130-145.
- Somers, Margaret R. (1992) Narrativity, Narrative Identity, and Social Action: Rethinking English Working-Class Formation. *Social Science History* 16(4): 591-630.
- Somers, Margaret R. and Gloria D. Gibson (1994) Reclaiming the Epistemological 'Other': Narrative and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Identity. Pp. 37-99 in *Social Theory and the Politics of Identity*, edited by Craig Calhoun. Oxford, UK: Blackwell.
- Taylor, Charles (1989) *Sources of the Self: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Ident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van den Berghe, Pierre L. (1995) Does Race Matter?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1(3): 357-68.
- Whitebrook, Maureen (2001) *Identity, Narrative and Politics*. London: Routledge.